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
2019 年 6 月，頁 1-82

BIBLID1012-8514(2019)63pp.1-82
2018.2.8 收稿，2018.6.29 通過刊登
DOI:10.6253/ntuhistory.201906_(63).0001

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
——以山越和姓氏為例的探討

陳　弱　水*

提　要

這篇論文主要研究漢末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東南原住人群，地域涵蓋當前的皖南山地、浙江中南部以及福建。本文由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對山越的若干探討，一是早期東南姓氏的研究。在本研究涵蓋的區域，兩漢時期幾乎都是原住人群的聚居地，漢末以後，郡縣統治和華夏化逐漸擴大，但土著及其後裔仍然是社會的主體。關於這些人群，記載非常稀少，連族稱都很難看到，以致學界只有零星的認識，本文希望有所突破。

關於早期東南人群，孫吳的山越是唯一訊息比較集中的個案。本文關注山越作為人群的性質，主要討論他們的族群色彩以及他們與國家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些課題，本文在深入程度和系統性上應該勝於以往的研究。本文也對早期東南姓氏進行考察，而這部分是和一個方法論的考慮相連結的。作者以為，為了追求對歷史經驗的多方了解，歷史研究應該積極面對文獻記載稀少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往往涉及眾多的人口和重要的社會文化結構。對於資料缺乏所帶來的限制，可以審慎運用「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的原理，廣泛搜尋具有推論潛能的訊息。姓氏是一種零散的訊息，孤立來看，大多缺乏知識意義，但如果大範圍、長時段內蒐集，有可能偵測出重要的現象。東南人群至遲從東漢晚期就普遍使用漢姓或漢式姓氏，本文對此進行研究，得出有關東南土著的重要認識。

關鍵詞：中古華南土著　山越　中國早期姓氏　華夏化　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joshuichen@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方法論的考慮
二、「山越」補論
三、從姓氏看東南原住人群
結 語

前 言

本文研究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首先要對這個課題涉及的時地提出說明。在地域方面，所謂「東南」，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安徽南部、浙江、江西與福建，秦漢以後，在很長的時間內，這還是原住人群活躍的地域。不過，在這個範圍之內，本文要排除兩個部分，一是杭州灣南北的平原，此處很早就成為江南的華夏核心區，另一則是江西，留待以後另行探討。本文涵蓋的地域可以用西晉武帝太康四年（283）的行政區做相當精確的表達——即當時的新安郡、東陽郡、臨海郡、建安郡和晉安郡。（附圖一）這個區塊的最大特點是多山，陳隋之際夏侯曾先的《會稽地志》如此描述會稽郡的地理位置：「南面連山萬重，北帶滄海千里」，上述五郡，大體就是這片「連山萬重」之地。[1]（附圖二）。

在時段上，「早期中國東南」主要指東漢晚期和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的脈絡裡，原住人群的概念基本上是針對華夏而發的，秦以前，長江以南華夏化的地區很少，談不上有意義的原住人群問題。秦漢之際，江南華夏化稍深的地方大概只限於當今江蘇南部、江西與湖南北部。舉例而言，漢文帝即位（179 BC）之初，南越王趙陀（當時仍稱帝）給他

1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點校本；以下簡稱《太平寰宇記》），卷 96，〈江南東道八〉，頁 1921。《會稽地志》又有稱《會稽志》或《會稽記》者，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 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封信，其中說，南越「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長沙指長沙國，就是後來的湖南中北部偏東一帶，「其半蠻夷」恐怕還是低估。至於南越所在的今廣東地，幾乎可說是全蠻夷了，趙陀在信中即自稱「蠻夷大長」。[2]兩漢時期，特別是漢武帝（157-87 BC）之後，隨著郡縣統治在華南的擴大和深化，華夏民與土著的分野浮現，漢末北方大亂，更令政府與江北移民的力量深入南方，廣大的華南土著深受衝擊。設法從他們的立場來認識這塊土地的歷史，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本文討論的時段，就整個中國史的架構而言，一般稱作「中古前期」。不過，兩漢之時，除少數區塊，本文所涵蓋的地域基本在中國統治之外，而且除了史籍所載的東甌、閩越國以及考古發現，我們對這個地區在漢末以前的情況可說毫無所知。以此，就這個地區而言，從東漢晚期到隋代只能說是早期歷史，而很難說是中古，因為「中古」假定了之前有「古代」，但在漢末之前，這裡大部分只能屬於「原史」時期。本文題目中的「早期」是界定「中國東南」而非「中國」的，但本文行文仍必須經常顧及中國史的整體脈絡，使用「中古」一詞和朝代名稱，還請讀者理解。

本文立意從事早期中國東南土著的研究，原因有二。首先是我對這個歷史問題有興趣。長江以南遠離華夏形成區，東南則本為所謂百越之地，早期在此建國的吳、越，華夏化的程度都很低，越國尤其如此。秦漢以後，華夏文化開始在長江下游平原生根繁盛，到唐宋之際，這裡連同東南的其他許多地域，一躍而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的新中心。關於這段歷程，深度的研究似乎還相當有限，以原住人群為中心的探討更是罕見。

其次，我想做個實驗：看如何研究歷史上的邊緣人群，更確切地說，如何研究文字社會中幾乎沒有文字資料的人群。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人類生活，不但在知識上，我們想了解各種各樣的人群，盡量多知道

2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南粵〉，頁 3851-3852。《史記》也記載此函，但不若《漢書》引用全文，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13，〈南越列傳〉，頁 2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些，而且在道德上，有責任如此做。我們不應該特別偏重某些人群，或某些形態的活動，如果這樣，我們得出的圖像是片面的，大體認識也容易偏差。可是在現實上，歷史學基本上是依賴文字資料所得出的知識，我們最了解的或是最能了解的，就是與文字關係密切的人。這些通常是有權者和知識分子，以及他們身邊的人。簡單說，歷史研究的一個困境是，就知識目標和倫理責任而言，它的對象是人類生活整體，但我們所奉行的方法準則，卻強迫我們不斷把眼光放在特定的人群，強迫我們默認生產話語的人掌握了歷史的發言權，於是，在歷史知識邊緣或其外的人，往往比在現實的處境中還要邊緣。如何突破這個困境——即使局部突破也好，是歷史學的重要課題。

現在想具體說明，我為什麼選擇早期安徽南部、浙江中南部與福建的原住人群作為研究課題。我想探討這些地帶土著的根本原因是，在早期帝制中國，這裡是南方原住人群的聚居地，但有關的記載卻特別稀少——少於華中、華南大部分其他地區，甚至連族稱都很難看到，政府與華夏士人通常只在特殊的時刻才對這些人群有所記錄和書寫，很適合作為探測史料與歷史知識關係的園圃。[3]以下分區略作介紹。

首先是安徽南部。這主要指安徽在長江以南部分的山區，其實也包含浙西一小塊地區，約略等於西晉宣城郡的南半部與新安郡，其核心地帶就是後世的徽州。直到漢末，在這裡活動的都是與郡縣統治關係甚稀的土著人群。

其次是位於今浙江中部偏西的錢塘江上游衢江流域盆地，約當西晉時的東陽郡。在東漢後期（2 世紀中葉），此地只有兩個縣：烏傷（今義烏）和大末（即太末，金華與衢州之間），郡縣化的程度約同於安徽南部。

3 考古發掘也顯示本文研究的地域在漢代有強烈的在地文化要素，例見劉波，〈浙江地區西漢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2000 年第 1 期（南昌），頁 58-69；吳春明，〈福建秦漢墓葬文化類型及其民族史意義〉，《東南文化》1988 年第 3、4 期（南京），頁 92-95、1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來則是前文所說的會稽以南「連山萬重」之地，即今浙江中南部山地與福建。橫亙整個漢代，這裡至多只能算是帝國的極邊疆。在東漢後期，從今浙江臨海以南至福建、廣東交界約十六、七萬平方公里之地，只有 3 個縣：章安（今臨海）、永寧（今溫州）、侯官（俗稱東冶，今福州），而福建境內只一縣。在此區域，政府有效管轄的範圍有多大，華夏化程度如何，可想而知。漢末許靖從會稽搭海船到交州（今越南北部），說他和同行者「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指的就是這一帶，至於「不見漢地」，則是逕視此為域外了。[4]在文化上，漢帝國的實質東南邊界在哪裡呢？從行政區分布看來，大概在會稽郡北端，今杭州灣南岸、錢塘江下游之地。三國吳末帝鳳皇三年（274），會稽人邵疇上言皇帝孫皓：「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邵疇可能是郡治山陰人，他的話似可支持上述的判斷。[5]

本文研究的就是上述幾個地區，我將利用不同的取向探討兩個課題，一個採用比較傳統的歷史研究法，另外一個則具有實驗性。在進入具體的個案之前，我想對如何研究資料稀少的問題，略作方法論上的反思。

一、方法論的考慮

如何研究缺乏史料的課題，如何突破史料稀少的限制，不能盲目而為，要有方法論上的基本考慮：歷史知識的基礎是什麼？它和史料有怎樣的關係？關於這個問題，近代史學有很清楚的看法，也可以說，這個看法是現代史學成立的基礎：歷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是，利用史料重建史

4 陳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8，〈許靖傳〉，頁 964。

5 引文見《三國志》，卷 48，〈三嗣主傳．孫皓〉，頁 1170 裴松之注引《會稽邵氏家傳》。至於邵疇鄉里或為山陰，則據李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點校本；以下簡稱《太平御覽》），第 7 冊，卷 871，〈火部四〉，頁 938 引《邵氏家傳》述及山陰人邵貞。同一會稽郡而有二邵氏家傳的可能性不高。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實，然後再解釋重建的史實——事情「何以如此」。這是 19 世紀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確立的原則，在中國，湊泊清代考證學，也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基礎，雖則中國學界對歷史解釋的強調不若西方。現在要提出的是，近幾十年來，有個小思潮對歷史知識建立的問題提出不同於上述的論說。這個說法和現代史學的實際工作方式有相當程度的契合，但是從知識論的角度，對歷史知識的性質與成立過程提出了特殊的說明。至少對我個人而言，在突破歷史知識的傳統邊界以獲取新知的問題上，這個說法很有啟發性。

我所談的是當代歷史哲學中的一個小潮流。如果說，韓培爾（Carl Hempel, 1905-1997）歷史知識論的關鍵詞是「涵括律模式」（covering law model），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關鍵詞是「再現」（re-enactment），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2018）的關鍵詞是「轉喻」（tropes），我所談思潮的關鍵詞就是「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這個對於歷史知識的論說大概如下。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的學問，但過去已經消失了，歷史學者必須利用目前可以觀察的資料，對過去是什麼樣子，何以如此，進行分析和推測。因此，本質上，歷史學是推論（推測）性的學問，推論的基礎則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史料。這種論說的涵義很多，我主要談談與實際歷史研究直接相關的涵義。

現代史學原來的根本想法是：史料是建立史實的基礎，因為史料是歷史現場遺留的紀錄，或接近歷史現場的人的聽聞，可以作為重建現場的根據。我所介紹的看法與現代史學正統觀的最大差別在於，這種看法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證據本身就是被解釋的對象，所謂史實重建就是解釋或推論，這種工作的結果可能有相當的確定性，也可能是不甚穩定的。在這種想法之中，史實重建與歷史解釋的區別並不明顯。尤有進者，史料的根本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的來源；史料的真義是，對探索已消失的過去的工作而言，史料是可被觀察、值得推敲的資料，它們是知識產生的基礎。如果讓我做一點引伸，個人以為，這種說法把原始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與二手資料之間的神聖區隔打破了。從實務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雖然應用時需要謹慎。

從「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歷史學並不是獨特的學問，有些其他學科也有相同的模型，譬如比較語言學、考古學、演化生物學。此外，「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也是很多重要知識的根據。舉例而言，當前科學家對於地球暖化原因的判斷主要就是基於這個模型。

除了「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我所介紹的說法有時還跟溯因推理的概念聯結在一起。邏輯推理的基本形態除了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美國哲學家 Charles Pierce（1839-1914）還提出溯因推理（abduction）的說法。「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就屬於或接近溯因推理。這是從已知現象出發，推導未知的推理。大略而言，它是演繹的顛倒。我這裡試著舉一個對比的例子。

演繹：

A 是公牛＋公牛是牛⟶A 是牛（恆真）

溯因：

A 是牛＋若干相關訊息和背景知識⟶A 很可能是公牛（概然）

演繹為已知事物（或假定事物）中的推理。溯因邏輯的特點是，能推演至未知，但結果是概然的。歷史屬於失落的、無法直接觀察的領域，適用此一邏輯。[6]

以上所述關於歷史知識性質的見解，對我們研究資料稀少的課題可以有什麼啟發呢？至少我個人得到如下的啟示。史料之所以作為歷史研

6 屬於上述論說形態的著作有：Leon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Leon Goldstein, *The What and the Why of History: Philosophical Essays* (Leiden: E. J. Brill, 1996);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lan Megill,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其中 Megill 是歷史學家，其他兩位為哲學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的基礎，並不完全因為它們是歷史現場的遺留物。事實上，我們知道，文獻的意義是很不穩定的，近幾十年有關人文或歷史研究的反省和批評，很多是針對文本的問題而發的。史料之所以能夠作為建立合理歷史知識的依據，是因為它們存在，可以讓我們檢視，作為推測看不見的世界的基礎，而不在於它們具有怎樣的先天價值。這樣的推論工作如果做得好，得出的認識有一定的可靠程度。依照這個道理，研究資料稀少的課題有兩個可能的著力點。首先，設法恰當發揮史料的推論潛能，而不僅著眼於它們重建事實的功能，這樣的做法可以擴大史料的知識建構能量。其實，歷史學者已經在使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了，特別是在上古史的領域，但是有意為之，力求嚴謹為之，可以達成更大的效果。其次，「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道理似乎也提示，獲得歷史知識，不一定要完全依賴傳統意義上的原始文獻，任何現在觀察得到、掌握得到，可能成為我們推論過去的資料，都可以作為建立歷史知識的根據。對我個人而言，這個論說具有鼓勵我們擴大訊息搜尋範圍，以突破歷史知識的傳統疆界的意義。這裡要重申，我們不是為突破而突破，而是要為達成歷史學的應有目標而尋求突破。

二、「山越」補論

現在進入本文的第一個個案：漢末孫吳的山越。在與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有關的課題當中，山越是唯一史料留存較多的一個（雖然數量並不大），因此歷來的研究很多，有的還相當精細。我完全無意再就此進行全面的論述，這裡想做的，是從社會結構——特別是早期華南社會結構——的觀點探討幾個特定問題，只能算是「補論」。不過，在提出看法之前，還是要對這個（或這些）人群做簡要介紹。

如名稱所示，山越的意思是山間的越人，他們活躍於漢末和三國時期的孫吳，常與孫吳政權有嚴重衝突，屢遭征伐，延亙了幾十年（約從 2 世紀末至 3 世紀 30 年代）。就史籍所見，山越主要分布於今天的安徽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南部、江蘇南部、江西東北部以及浙江中、北部偏西，另有浙東一例，也偶有地域指涉模糊的情況。[7]山越基本上活動於郡縣統治之外，他們的族群成分如何，學界有爭論。三國之後，特定人群意義的「山越」名稱變得罕見，一個原因大概是華夏化，也有學者認為，有些地方的山越可能被改作他稱。[8]有關這個問題，本文稍後會有所補充。

由於過去對山越的研究重點在於其族群性格，本文也要從這一點出發。關於山越，有一個以近代史學大家呂思勉（1884-1957）與唐長孺（1911-1994）為代表的看法，這就是：山越不能算非漢族，山越基本上是指住在吳越之地山區的人，其中不少是因犯罪和逃避賦役逃至山中，其他有些可能是古越人的後代，但他們應該都已華夏化了。呂、唐兩先生的基本論點是，山越與平地的編戶並無本質（族群）上的差異，唐先生甚至引《魏書．羊深傳》稱山東泰山附近的人為「山齊之民」來做佐

7 近人研究中，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中的「山越分佈圖」包括今江西全境，顯然太廣。陳文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歷史論叢》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 161-176，圖見頁 175。有人還把華南內陸地區的許多土著一併歸為山越，更不足深論。見程凌雷，〈建國以來山越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 年第 2 期（北京），頁 6。

8 三國以後至南朝齊梁，傳世文獻幾乎不見「山越」之名，陳、隋史料中又較頻繁出現，其中有指稱後世浙東、福建人群的情況。見姚思廉撰，《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3，〈世祖本紀〉，頁 46；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24，〈王准之傳〉，頁 666。不過，隋唐以下，「山越」一詞似乎愈趨遠於實際，有時泛指華南土著，有時僅為典故使用。泛指華南各地土著之事，可例見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46，〈蘇孝慈傳〉，頁 1259（桂林）；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77，〈盧鈞傳〉，頁 4592（嶺南）。三國以後山越名稱的用例可略見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蛮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 446-447。至於山越改用他稱的可能性，參考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5 年 6 月，臺北），頁 18-21；呂思勉，〈山越〉，收入氏著，《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640-645；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 3-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證。[9]他們的說法有其根據，但也有可商榷之處。在一個晚近的研究中，呂春盛指出，姑不論山越或漢末三國的山民中有多少是入山的平民，姑不論山越的族群內涵為何，山越在當時是具有蠻夷或異族形象的。[10]個人以為，這是很重要的論點。現在想以這個認識為基礎，為山越的族群性格問題再進一解。

現在學界都了解，族群的差別並不只是人群語言、文化、生活方式歧異的問題，人群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如何看待某人群，以及這些看法所構成的認同與認定，也是族群形成的要素，有時重要性更勝客觀的界線。在山越的問題上，漢末三國之時，政府與主流社會把山越視為具有族群性質的他者，殆無疑義。

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十月，曹丕（187-226）登基為皇帝，國號魏，孫權（182-252）遣使稱藩，曹丕給他的策命中有言：

> 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在北方政權的認識裡，江南社會是由「民」和「夷」所構成的，此時孫權集團經略今湖南地未久，曹丕所說的「東南」、「江外」應該主要指長江下游一帶，詔中確實也有「懷柔百越」之語，這無疑是以山越為江南之「夷」。[11]

以山越為蠻夷，不但是北方人的觀點，孫吳政權自己也這樣看。《三國志・吳書》記載，獻帝建安七年（202），孫權命朱治（156-224）為吳郡太守，「征討夷越，佐定東南」；[12]吳大帝黃武二年（223）秋天，魏軍襲吳，《吳書》則說：「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

9 呂思勉，〈山越〉，頁 640-645；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 3-29。

10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 10-13。

11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2。可笑的是，孫權在嘉禾二年（233）封遼東公孫淵的詔書中，大量抄襲曹丕的策命，「民夷安業，無或攜貳」之句一字不改。見同書，卷 47，頁 1138 裴松之注引《吳書》。

12 《三國志》，卷 56，〈朱治傳〉，頁 13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權卑辭上書。」[13]上引文句雖然來源不明，但頗有可能出於吳國自己的文獻，前者尤其明顯。此外，吳大帝嘉禾元年（232），孫權想攻打遼東的公孫淵（?-238），陸遜（183-245）之弟陸瑁（?-239）上書勸阻，其中有言：「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意思是，如果不能立刻剿滅遠在北方的公孫淵，可能造成吳國後方動亂。[14]《資治通鑑》胡三省（1230-1302）注「山虜」曰：「謂丹楊、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大體不錯；[15]「虜」原為鮮卑之代稱，有外族的涵義。

此外，《漢書．地理志》「丹揚（即丹陽）郡」條有言：「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黝」就是「黟」，「漸江」則為浙江，此句《水經注》引為：「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16]皖南黟縣位處山越的大本營，東漢初班固（32-92）寫《漢書》時逕視為南蠻之地，班氏去世於公元92年，一個世紀後，這個形象恐怕還沒有完全褪去。

事實上，在孫吳，「越」本身就有異類的意味。先舉一例，吳大帝嘉禾三年（234），諸葛恪（203-253）主動要求深入丹陽與鄰近諸郡交接的山地，討伐山民，就史籍所見，這是孫吳最後一次對山越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為此，孫權封諸葛恪為「撫越將軍」。[17]這個名號顯示，雖然孫吳立國的核心就在吳越，「越」可以是被鎮撫的他者。

還有一個類似事例，出現在不同的地方。約在獻帝建安十年（205）前後，侯官（今福州）一帶發生亂事，孫權派蔣欽（168-219）和呂岱

13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5。

14 《三國志》，卷57，〈陸瑁傳〉，頁1338。

15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72，〈魏紀四〉，頁2288。不過，《三國志》及該書裴松之注所引文獻似未有將廬陵、豫章郡土著視為山越的情況。

16 《漢書》，卷28上，〈地理志〉，頁1592；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卷40，〈漸江水〉，頁3275。

17 《三國志》，卷64，〈諸葛恪傳〉，頁1431。諸葛恪封將軍號的年份，是依他的年歲估算的，《資治通鑑》亦定於此時，見卷72，〈魏紀四〉，頁230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161-265）征伐，蔣欽事後授為「討越中郎將」。[18]這顯然意味，閩北的人是族群意義上的越人，而非華夏。這個觀點在《三國志・吳書》的一段記事也有表現。早先在建安元年（196），孫策（175-200）派賀齊（?-227）至侯官，征討自立名號的官長豪強。據《三國志》記載，賀齊兵力不如對方，於是採離間之計，「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19]這段史文來源為何，已不得而知，但有可能出自孫吳的著述如韋昭《吳書》。[20]「越人」比「山越」之名更具疏離色彩，在山越活躍區，某些山間的人群是異類，到閩北這樣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是。附帶說明，孫吳統治華南期間，與政權一再發生衝突的所謂「山越」，集中於前段所說的諸葛恪征伐之地，即吳、會稽、丹陽、新都、鄱陽等郡交接處，孫權還於黃武七年（228）在這一帶別置東安郡，數年後罷廢。[21]侯官所在的建安郡不屬於這些衝突的核心地帶，此處人群與長江下游統治集團的關係當然也更遠。（參見附圖三、四、五）

關於越人及「越」的異族性或非華夏性，還可以從周處（236-297）《陽羨風土記》看到端倪。該書早已散失，有佚文曰：

> 越俗，飲讌即皷，拌以為樂。取大素圜柈，以廣尺五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蹀地擊掌以應，柈節而舞。[22]

又有文曰：

> 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要間五尺刀以與之為交。

---

18 《三國志》，卷 55，〈蔣欽傳〉，頁 1286；卷 60，〈呂岱傳〉，頁 1383-1384。

19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7-1378。

20 《三國志・吳書》主要參考吳國官修之韋昭《吳書》，為學界通說，參考陳博，〈韋昭《吳書》考〉，《文獻》1996 年第 3 期（北京），頁 68-77。

21 《三國志》，卷 60，〈全琮傳〉，頁 1382。另一說為黃初五年（224）設，七年（226）廢，見同書卷 47，〈吳主傳〉，頁 1133-1134。

22 《太平御覽》，第 5 冊，卷 567，〈樂部一〉，頁 437 引。這段文字也見於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新 2 版據 1965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影印），卷 73，〈雜器物部〉，頁 1256；《太平御覽》，第 7 冊，卷 758，〈器物部三〉，頁 105。但這兩段引文顯然已經修整，不若本文正文所引之存真。

臺灣人類學知識資料庫

> 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為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地人畏不敢犯也。祝曰：……[23]

前段文字有費解處，但大意可知，是描寫越人宴飲後以大圓盤為鼓打節拍，跳舞的人邊跳邊擊掌以和；後者則敘述越人訂交的禮儀。陽羨是周處的家鄉，即今江蘇宜興，但他所寫的「越俗」，顯然不是自己生活圈的習俗，而是他所聞見的「他者」。逯欽立（1910-1973）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引《陽羨風土記》越俗祭禮這段文字，特別加上按語：「其所謂越，指當時山越，非春秋時代越人也。」[24]這個說法不錯，周處是以吳越華夏士大夫的身分記述土著風習，但要指出，陽羨其實和山區頗有距離，可見這些越俗也存在於平野。孫堅（155-191）、孫權的家鄉在今浙江富春，屬於古越地，在他們所建立的政權，「越」卻有異族的意味，毋寧是相當諷刺的。看起來，華夏化也代表著某種程度的自我異化。

以上所述為東漢至西晉的情況，即使到了隋唐之際，東南山區為蠻夷之地的形象也沒有完全褪去。《隋書》載，文帝開皇十年（590）江南動亂，郭衍（?-611）隨軍征伐，「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25]「洞」是南北朝中晚期以後，漢文文獻中對南方土著聚落的通稱。[26]上引文句中涵蓋的地方，都是越人故地，「宣城、黟、歙」尤其是山越大本營。《隋書》所寫，恐怕不僅是歧視性的表述，即使在這個時候，當地還是有非華夏人群。

---

23 《太平御覽》，第 4 冊，卷 406，〈人事部四七〉，頁 379 引。在此版本，「其壇地」作「其壇也」，「也」應該是錯字。參見四部叢刊三編本《太平御覽》（收入子部第 3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同卷，頁 2006-2。

24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晉詩卷十八〉，頁 1019。此書收錄《陽羨風土記》中的訂交祭禮祝語，訂名為〈越謠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將此歌列為「古辭」，逯欽立不同意，故有此按語。參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點校本），卷 87，頁 1222。

25 《隋書》，卷 61，〈郭衍傳〉，頁 1740。

26 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頁 455-466。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3 世紀之初，南方與北方政權都把山越視為異族，山越怎麼看待自己和主流社會呢？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但是以理度之，被優勢集團當作他者的人群，對於那個集團多少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另外，我們還是要問：郡縣有效統治內的社會主體與山越之間有沒有實質性的族群差異呢？在這一點上，一份東漢後期的資料或許可給我們提示。抗徐是丹陽人，為活躍於桓帝時期（147-167）的名將，據《後漢書》所記，他年輕時擔任本郡宣城縣長（今安徽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27]宣城往南即是山區，也就是後來山越的集中地。事實上，東漢後期已經有「山越」、「越寇」的說法了，[28]《後漢書》所謂「深林遠藪」之人無疑即是山越，抗徐的傳記形容他們為「椎髻鳥語」，語言服貌與華人不同。

山越所說的「鳥語」是華夏語還是古越語的遺留，或是兩者的某種混合？都有可能。語言演變很快，說同種語言的人群分離若干年歲，後代就會漸漸聽不懂彼此的話（mutually unintelligible），如果漢晉之際山越說的是主流社會的人感覺異樣或難以了解的華夏語，出於歧視的心理，還是有可能被形容為「鳥語」。另一方面，說古越語的人群曾經有過強大的力量，建立起吳國和越國，留下大量的越語人名和地名，也有少數語言資料存於文獻。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特殊的。[29]秦漢之際，江

27 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38，〈度尚列傳〉，頁 1286。

28 《後漢書》，卷 8，〈孝靈帝紀〉，頁 330；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影印），卷 103，〈費鳳別碑〉，頁 6-7。〈費鳳別碑〉錄文原出洪适《隸釋》，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史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固安劉氏藏明萬曆刊本影印），卷 9。

29 古越語文獻見《說苑・善說》的越人歌及《越絕書・吳內傳》的維甲令。語言學家曾根據不同的語言——如南島語、壯語、泰語——對這些文獻進行解讀，但顯然尚未達成共同的認識。有關討論見泉井久之助，〈劉向「說苑」卷第一の越歌について〉，《言語研究》22、23 合冊（1953 年 3 月，東京），頁 41-45；鄭張尚芳著，孫琳、石鋒譯，〈《越人歌》解讀〉，收入南開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論叢》編委會編，《語言研究論叢》第 7 輯（天津：語文出版社，1997），頁 57-65；鄭張尚芳，〈句踐「維甲」令中之古越語的解讀〉，《民族語文》1999 年第 4 期（北京），頁 1-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顯然還有講越語的人，《太平寰宇記》引《吳越春秋》曰「秦徙大越鳥語之人置暨」，「暨」即後來的於潛縣，但「於潛」恐為越語原名，「暨」反而是華夏化的省字。[30]東漢、三國之際，江南大部分的縣級地名都還是越語，如烏程、烏傷、於（讀烏）潛、餘暨、餘姚、餘杭、餘汗（讀干）、于湖、由拳、會稽、故鄣、句容、句章、太末（大末）、鄞，縣級以下的地名就更不用說了。此外，西、東晉之交的郭璞注揚雄《方言》有言：「今江南山夷呼虎為㺜，音狗竇」，明顯不是華夏語詞。[31]在上述背景之下，孫吳時代，如果山深距城遙遠之處還有人講越語或越語和華夏語的混合，並非不可想像之事。至於浙南、福建等遠離主流社會的地區，講非華夏語應該就是常態了。[32]

以上的討論，簡單說，是在試圖揭示，孫吳政權和其所代表的社會主體（其實不能完全代表）與山越之間的關係是有族群性的，這個性質有多強，形態為何，難以細判，但是明確存在。再來要談山越的組成和實際性質：他們是以因戰亂脫離郡縣統治的逃戶為主，抑或自來就是具有獨立性的人群？也就是，他們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位置為何？

在這個問題上，距離長江下游遙遠的浙南、閩北與國家和華夏社會關係不深，當地住民大體為世居土著，當無疑義，今皖南、浙西、贛東北的山越情況如何，則須稍予討論。在這一點上，《三國志．吳書》對公元 234 年諸葛恪欲伐山越的記述提供了最清晰的資訊。關於諸葛恪自求入山，該書是這樣描述的：

>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眾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

30 《太平寰宇記》，卷 93，〈江南東道五〉，頁 1866。此句不見今本《吳越春秋》。

31 周祖謨，《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 據 1951 年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本影印），卷 8，頁 51。

32 川勝義雄曾對山越的語言問題有所討論。見其〈孫吳政權と江南の開發領主制〉，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 153-154。他不同意呂思勉和唐長孺對山越族群性質的看法，見同書頁 154-156。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

> 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33]

這段文字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孫吳雖曾屢次征討山越，諸葛恪認為，那些行動掠奪到的，不過是「外縣平民」。「外縣」是指靠近孫吳核心區的地方，「外」是就山地的觀點而言；「平民」照字義，則為一般老百姓，這裡大約指居處鄰近編戶的人。第二，諸葛恪的對象是「幽邃民人」，一生都在山林，而且「前世以來，不能羈也」，顯然是世居山地的人群。第三，諸葛氏也說，「逋亡、宿惡」跟「幽邃民人」共同逃竄，但他們並不是山居者的主體，如果要以這段文字來指稱山越主要來自漢人入山，就不符合文意了。

諸葛恪征伐成功，擄獲大量民眾後，孫權派薛綜（?-243）前往勞軍。薛綜致諸葛恪的賀文有言：「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34]這段文字也顯示，山越向來沒有臣服於華夏郡縣的統治（「不賓歷世」），但從「緩則首鼠」之語看來，也非完全無關，至於「種黨」、「獻戎」云云，都有非我族類的意味。山越作為具有獨立性的人群，有時也可以從他們與郡縣並舉的書寫透露出。譬如，黃蓋（145-222）詐降曹操（155-220）時上書有言：「孫氏……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35]「六郡」與「山越」是孫吳統治下兩個分立的元素。此外，朱治是丹陽郡故鄣縣人，追隨孫堅、孫策、孫權父子各處征討，他年邁時思念故鄉，「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朱治當是縣治或其附近的人，他歸鄉駐軍，來威

33 《三國志》，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1。
34 《三國志》，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2。
35 《三國志》，卷 54，〈周瑜傳〉，頁 1263 裴松之注引《江表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震安撫周遭的治外人群。[36]

從漢末到三國，浙江中北部與皖南的山越顯然是具有不等獨立程度的人群，浙南和福建的「越人」就更不必說了。我們是否知道，或能否推測，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形態？西漢中期至南北朝的東南人群有個特色，就是資訊很少，幾乎沒有族稱，山越是例外，從三國之後到南朝梁，史籍中這塊地區又歸於沉寂，一直要到陳霸先崛起廣州，情勢才有變化。個人瀏覽有關此地的傳世史料，唯一見到的重要早期文化特徵是，當地流行懸棺葬，也就是，人死後停棺於山上岩石間、峭壁上以為葬。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志》載今溫州瑞安之民：「父母死亡，殺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墎也。」[37]今閩西北建安郡亦有此俗，梁蕭子開《建安記》美稱為「懸棺仙葬」。[38]浙南與閩北不屬山越核心區，以上所述不足以說明與孫吳關係最密之山越的文化狀態，但以此例彼，皖南、浙中的人群若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土著文化，也是情理中事。前引周處《陽羨風土記》記述越俗，朋友訂交祭以白犬，就和浙南殺犬祭父母有相似之處。[39]

東南人群闃然無聞到極少表現族群色彩的情況，不但不同於長江流域的「蠻」，也與嶺南、交州有差異。這種情況可能意味，這裡的人群零散而地位平等，缺乏大型、階層化的有力組織。這跟三國時長江中游的「蠻」有「夷王」（朴胡、梅敷、梅頤），是非常不同的。[40]在漢末

36 《三國志》，卷 56，〈朱治傳〉，頁 1305。

37 《太平御覽》，第 7 冊，卷 780，〈四夷部一〉，頁 260 引。《臨海水土志》一書異稱甚多，見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 57。

38 《太平御覽》，第 1 冊，卷 47，〈地部十二〉，頁 386，「闌干山」條引；另見同頁「武夷山」條。又可參《太平寰宇記》，卷 101，〈江南東道十三〉，頁 2016，「建陽縣」條。再往西南的贛南也有此俗。見《太平御覽》，第 8 冊，卷 884，〈神鬼部四〉，頁 94 引南朝宋鄧德明《南康記》。許多其他華南內陸地區亦有。

39 《隋書・地理志》載今浙江中南、閩北、江西有畜蠱的習俗，亦可參考。見《隋書》，卷 31，〈地理下〉，頁 887。

40 《三國志》，卷 1，〈武帝紀〉，頁 46；卷 56，〈朱然傳〉，頁 1307；卷 58，〈陸遜傳〉，頁 1351。《晉書》中也記錄了東晉初年的「蠻王」向鑒，見房玄齡等撰，《晉書》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國時期的江南，山越當然有領導者，如史籍中所稱的「渠帥」、「魁帥」、「賊帥」，有的甚至為曹魏所知，費棧就是這樣的人物，[41]但他們的勢力似乎缺乏政治架構或強大共同體的支撐。至於山越的生活方式，顯然以農業經營為主，也會製作金屬器。[42]他們可能也狩獵，前引《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形容山民為「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不能不令我聯想起臺灣的山地原住民。當漢末三國之際，吳地仍然遍布榛莽山林，孫策、孫權都特好打獵，孫權還曾在今江蘇溧水一帶獵虎。[43]這裡屬於吳地的平原帶，山越所居之處景況如何，可想而知。

總結以上，山越與孫吳政權的關係具有明顯的族群性質，山越的成分主要是獨立於郡縣之外的原住人群，逃戶應該只佔少數，至於其文化內涵，則因資料不足，難以具體言說。另外要提出一點，過去學者一般把孫吳轄下的越人都視為山越，但細繹當時史料，「山越」之稱絕大多數用於蘇、皖、浙、贛交界的人群，該地與浙東、浙南被錢塘江上游河谷所分割，說不定是不同的文化區。[44]（見附圖六）

最後要談山越與國家及社會主體的實質關係。在漢末三國，山越與國家最主要的關係當然是雙方歷時將近 40 年的衝突。造成這段血腥歷史的原因，顯然不只一端，孫吳政權和山越兩方都有主動的作為。不過學者已經指出，這些事件背後的一個重大因素是，孫吳政權刻意擄掠山越人口，作為兵源，進入軍隊的山越，並不全部成為兵士，也有從事農耕，

（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81，〈鄧嶽傳〉，頁 2131。

41 《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18 裴松之注引《吳書》；卷 58，〈陸遜傳〉，頁 1344；卷 60，〈周魴傳〉，頁 1387、1391；卷 60，〈鍾離牧傳〉，頁 1393。

42 《三國志》，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1-1432。

43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0。孫權的兒子孫奮在南昌也游獵不止。見《三國志》，卷 59，〈吳主五子傳．孫奮〉，頁 1374。

44 孫吳時代，在漢會稽郡的範圍（即後世浙東、浙南、福建），人群被具體指為「山越」者，僅賀齊破剡縣（今浙江嵊州）斯從記事一例。見《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7。另偶有地域指涉模糊的情況。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供給軍糧的。漢朝末年，中國動亂不斷，戶口逃亡甚多，加上社會結構發生變動，私屬人口大增，郡縣領有編戶大減。於是，國家也仿效豪強大族，找尋自己的依附人口，以確保資源，曹魏和孫吳實施屯田制，都出於這個意圖。在江南，山越成為孫吳政權與將領掠奪的對象，前述諸葛恪深入山區的大規模討伐，沒有受到任何挑撥，完全是為奪取人口，還有山越領袖戰敗後交出部屬充作孫吳兵士的。[45]此外，孫吳的兵制大體為世襲，軍士成為將領的家產，世代相傳，將領擄獲人口後，也往往分給下屬。就社會史長期的角度而言，這些行動代表人群破滅，成員受政權與軍隊役使，後代即使被解放，也留在郡縣治下，流入社會主體。在中國歷史上，郡縣的擴大、治外人群的縮減，雖然並非遍地皆然，但確實是廣泛的趨勢，孫吳征伐山越，正是這個過程的極端表現。[46]

孫吳政權擄獲的山越人口，主要作為兵源，但也有編為戶口的情況。建安二十二年（217），陸遜破丹陽郡費棧領導的山越，就「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47]吳大帝嘉禾四年（235），孫權派人剿除嶺南土著羅厷的勢力，顯然也將餘眾編戶供賦役。[48]在山越方面，陸遜所為或許並不是孤例。

前面談過，漢末孫吳之時，國家視山越為蠻夷，兩者之間具有族群性的關係。國家對山越還有一個特殊的觀點，即他們是「惡民」、「宿惡」，需要教化。這些詞彙頻繁見於孫吳史料，大約是當時的公文用語。[49]以山民為「惡」，一方面是出於偏見，另方面恐怕也有合理化出

45 《三國志》，卷 60，〈鍾離牧傳〉，頁 1393。

46 關於孫氏政權擄掠山越以為兵源的相關問題，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 14-25；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入《學術研究》編輯部編，《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 10-16；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 17-18。胡守為認為，孫吳的將領私兵制，只是兵權世襲，不代表子孫能接收父祖的全部軍隊。

47 《三國志》，卷 58，〈陸遜傳〉，頁 1344。此事之時點依《資治通鑑》所定，見卷 68，〈漢紀六十〉，頁 2153。

48 《三國志》，卷 60，〈呂岱傳〉，頁 1385。

49 《三國志》，卷 52，〈顧雍傳〉，頁 1228 裴松之注引《吳書》；卷 55，〈潘璋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兵行動的涵義。此外，這種用語也反映了一種意識形態，就是國家當以教化為己任，人群臣服於國家，就是「從化」、「慕化」，這在史籍中也有表現。[50]至於多少人把這個意識形態當真，很難說，個人猜測，在當時除了士人和官員，真心相信的恐怕有限。

山越和孫吳政權的關係應該是以衝突為主，但他們和社會主體的關係並不全然如此。在山越研究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山越與「宗部」（或稱「宗伍」）的關係。「宗部」的意思，大約就是親戚同姓之人組成的團體，他們的領袖常被稱為「宗帥」，「宗民」則指成員，也有「宗人」、「宗兵」等說法，至於這種團體與歷史上其他時代、其他地域的宗族有何可能異同，此處姑且不論。史籍中有些關於山越的記載，和宗部一起出現，兩者關係為何，學界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兩者基本相同，宗部就是有組織的山越，有人以為兩者有區別。[51]一般討論中，和山越有關的宗帥特有三人：斯從、嚴白虎、祖郎，以下分別評析。三人之中，斯從顯然不是山越。《三國志．賀齊傳》有文：「〔斯〕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52]斯從是會稽剡縣人，史文說他為山越所附，則似乎不屬山越，但他的族人的確不住縣治城內。剡縣即後世的嵊縣，四周環山，斯從的族黨與山越關係匪淺。《三國志》記載，孫吳將領太史慈在歸從孫策之前，曾經自稱丹楊（陽）太守，進駐涇縣，「大為山越所附」。[53]太史慈來自山東半島，當然不是山越，上引的表述應可佐證，斯從大概不是山越。

頁 1299；〈張溫傳〉，卷 57，頁 1331-1332；卷 58，〈陸遜傳〉，頁 1344、1352；卷 60，〈呂岱傳〉，頁 1385；卷 60，〈鍾離牧傳〉，頁 1394；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1。呂思勉認為「宿惡」一定指「中國人」，似乎未必如此。見其〈山越〉，頁 642。

50 《三國志》，卷 52，〈顧雍傳〉，頁 1228 裴松之注引《吳書》；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1。

51 有關討論可參見：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 3-14；胡守為，〈山越與宗部〉，頁 1-10；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0 期（北京），頁 66-69；程凌雷，〈建國以來山越研究述評〉，頁 4-6。

52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7。

53 《三國志》，卷 49，〈太史慈傳〉，頁 1188。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嚴白虎是孫策征戰江南時，所面臨的最大在地勢力之一。他是吳郡烏程「彊族」，但勢力範圍顯然甚廣，史籍中曾稱他為「山賊」。[54]《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對這個稱呼的說明是：「嚴白虎有眾萬餘人，阻山屯聚，在吳郡之南」，應是正解。[55]嚴氏的家鄉烏程即今浙江湖州，在太湖南岸平地，但烏程西南則為綿延之山區，他就以此為基地。山區中顯然有山越，但無跡象顯示白虎和他們有什麼特別關係。[56]最早把他與山越連在一起的是注《三國志》的裴松之（372-451），裴氏未必有把嚴白虎視作山越的意思，但可能造成誤導。[57]

至於祖郎，曾被稱為「涇縣山賊」，《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說袁術（155-199）曾授官給「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祖郎活躍於丹陽郡中南部的涇縣、陵陽縣，這裡是山越集中之地，他與部眾屬於山越人群的可能性較高。[58]三人之外，有關江南宗部、宗帥的記載還有少數，但除了一位焦已因資料太少難以判斷，其他顯然都與山越無關。[59]舉例而言，鄱陽郡上繚縣是一個宗部重鎮，但不見任何與山越聯手的跡象。[60]

---

54 《三國志》，卷 56，〈朱治傳〉，頁 1303。另參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04-1105 裴松之注引《吳錄》，頁 1107 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卷 56，〈呂範傳〉，頁 1310。

55 《資治通鑑》，卷 61，〈漢紀五十三〉，頁 1975。

56 吳末帝孫皓寶鼎元年（266）分吳郡、丹楊郡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一個主要理由就是「鎮山越」。見《三國志》，卷 48，〈三嗣主傳・孫皓〉，頁 1166 裴松之注引孫皓詔書。

57 裴松之對嚴白虎的評論見《三國志》，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12。原文如下：「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

58 以上引文見《三國志》，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01；卷 51，〈宗室傳・孫輔〉，頁 1211。其餘有關資料見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04；卷 50，〈嬪妃傳・孫破虜吳夫人〉，頁 1195；卷 55，〈程普傳〉，頁 1283；卷 56，〈呂範傳〉，頁 1310。

59 焦已活動範圍似與祖郎接近，但訊息只一見，難以多談。見《三國志》，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04。

60 見《三國志》，卷 14，〈劉曄傳〉，頁 443-444；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史籍所載的宗部、宗帥中，除了祖郎，都難以視為山越，但其他宗部應有與山越關係密切者，斯從就是明確的例子。我們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山越會和特定的宗部來往，這至少顯示，山越——特別是接近平地或城邑的山越——有時和社會主體頗有交接，而主流社會成員對待治外人群的態度，未必與政權或軍政領袖一致。至於宗部的社會位置，大抵在郡縣治下，是具有濃厚共同體色彩的集團，承平時期應已存在，漢末大亂後其勢力與獨立性更增。

以上討論有關山越的三個問題：族群色彩、游離於郡縣和社會主體之外的人群性格、與國家和社會主體的多重關係，希望能夠增益我們對於這些群體的了解。山越崛起於漢末巨變之際，他們在史籍中所顯露的種種樣貌，可能因為處於特殊的情勢而與平時有差異，但也正是亂局所帶來的放大顯影效果，讓我們有機會觀察到難得出現於士人與國家書寫中的東南土著。其他早期的東南人群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最後談一下山越後裔的問題。前面提過，三國之後，特定人群意義的「山越」名稱罕見，從西晉到南朝齊、梁，傳世文獻中幾乎不見蹤影，陳、隋後才又出現，但意義常變得寬泛。[61]這裡要指出，孫吳以後，其實史籍中還是有山越後裔的紀錄，這些人也幾乎都是和反亂相連結的，只是他們沒有背負「山越」或其他具有族群意味的標籤。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位於當今皖南的宣城郡。史籍記載，東晉成帝咸和二年（327）蘇峻（?-328）亂起，宣城內史桓彝（276-328）想馳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他先按兵不動。[62]宣城的山地在該郡南部，就是漢末孫吳山越集中之地。梁武帝天監九年（510），此地則有「山賊」吳承伯起事，蔓延至南邊的新安郡，即後世徽州之地，更是原來山越的

1104；卷 49，〈太史慈傳〉，頁 1189；《資治通鑑》，卷 62，〈漢紀五十四〉，頁 2011。

61 見本文註 8。

62 《資治通鑑》，卷 93，〈晉紀十五〉，頁 2948。同樣的記述，在《晉書》，「山民易擾」作「山人易擾」，《晉書》成於貞觀年間，顯然是避唐太宗的名諱，所以這裡取《資治通鑑》的語句。參見《晉書》，卷 74，〈桓彝傳〉，頁 1940。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

大本營。[63]這些「山民」、「山賊」恐怕大都是山越後裔，即使到 6 世紀，也未必都華夏化了。另外還有梁武帝時會稽山賊屢起的記載。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山賊聚集，攻打會稽郡諸縣；大同三年（537）山賊又起；太清三年（549）再有山賊田領羣（羣或作郡）起事。[64]會稽郡除了杭州灣南部一帶，大多為山地，也是廣義的山越舊地，這些「山賊」大概也多孫吳時越人之後。簡單說，從西晉到南朝，即使在接近華夏核心區的蘇南、皖南、浙北，山間仍有疏離於郡縣統治的人群，其中如果有越人文化和認同的持續，也是情理中事。

三、從姓氏看東南原住人群

本文要探討的第二個課題是早期中國東南（漢末至隋代）原住人群的姓氏。姓氏制度形成早而普遍，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世界史上罕有其匹，秦漢以後，與華夏有密切接觸或受其影響的人群受此沾染，往往也使用相同或類似的命名方式。就史籍所見，西漢東甌、閩越國人尚未使用漢式姓氏制度（兩國亡於漢武帝元封元年，110 BC），漢末該地訊息再現，住民幾乎都帶漢姓。以此，姓氏研究或許可以成為認識早期東南人群的一道途徑。[65]不過，整體來說，華南姓氏是相當貧瘠而不穩

63 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15，〈謝覽傳〉，頁 265；卷 21，〈蔡撙傳〉，頁 333；《南史》，卷 29，〈蔡撙傳〉，頁 775。吳承伯是郡吏，顯然為當地有力人士，他的起事似乎也有宗教色彩。

64 中大通二年事見《梁書》，卷 3，〈武帝下〉，頁 74。大同三年事見《隋書》，卷 21，〈天文下〉，頁 595；卷 23，〈五行下〉頁 664。田領羣見《梁書》，卷 44，〈南郡王大連傳〉，頁 616；王欽若撰，《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影印明刻本），卷 290，〈宗室部．立功第一〉，頁 3415-2。此外，南齊武帝永明四年（486），寓居桐廬的富陽人唐寓之起事，並攻襲錢塘（今杭州）和東陽郡，桐廬、富陽在錢塘江西岸，亦多山地，唐氏也有「山賊」之稱。見蕭子顯撰，《南齊書》，卷 3，〈武帝紀〉，頁 51；卷 44，〈沈文季傳〉，頁 776-777；《南史》，卷 31，〈張稷傳〉，頁 817。

65 漢初東甌、閩越王族及軍將絕大多數未使用漢式姓名（姓＋名），以下諸例可證：搖、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定的資訊。根本原因在於，華南本土語言大都和漢語一樣，具有強烈的單音節性格，造成原住民大量直接採用漢姓（有時也自創漢式姓氏），土著與華夏經常難以分辨，這和華北阿爾泰與伊朗語系背景的胡人名字易於識別，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66]此外，早期華南土著地域的姓氏資料稀少，分析不易。但是如本文起始所說，研究基層與非主流社會，特別是較早年代，往往面臨史料闕如的狀態，對此，我們有尋求突破的責任，不能任憑歷史知識集中於有限的課題。姓氏研究就是本文尋求突破的實踐。我將盡量蒐集早期東南的姓氏資料，再參考其他——包括後代的——訊息，希望對這些零碎的資料提出恰當的解釋。說不定，有關東南原住人群的重要新認識能夠從這樣的工作中迸發出來。

（一）早期華南姓氏的一般狀況

本節企圖根據姓氏資料進行有關早期東南人群的探索。個人以為，要評估東南住民姓氏的涵義，必須先對華南的姓氏有廣泛的了解。為此，我對從漢到隋的華南姓氏資料做了兩個基本考察：第一是自今湖南以東、五嶺以北的主要姓氏，但排除了華夏化最深的吳地（太湖周邊），會稽郡的平原帶則列入；第二是華南的原住民姓氏，地域擴及嶺南、湖北、四川東部。我把蒐集的主要成果列於附表一和附表二，分別說明，以揭示華南姓氏的若干特點。

首先是附表一。這個表蒐羅的是特定地域的姓氏資訊，地域背景不

無諸、郢、餘善、丑、敖、居股、說、福、多軍、甲。統治階層如此，一般民人如何，可想而知。見《史記》，卷 114，〈東越列傳〉；《漢書》，卷 64 上，〈嚴助傳〉。東甌、閩越所統地相當於後日的浙江南部與福建北部，該地命名習俗之華夏化，應該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可惜尚無資料可證。又，在 1958 年發現的福建崇安漢城，許多陶器和瓦上印有文字，有些看來是漢姓或漢式姓氏，但以該遺址不易斷代，資訊過於孤立，此處不論。參見楊琮，〈福建崇安城村古城遺址出土文字及考釋〉，《東南文化》1993 年第 1 期（南京），頁 118、123。

66 華南本土語言顯然主要是壯侗語（Tai-Kadai languages）和苗瑤語（Hmong-Mien languag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確的姓氏則不收入。我們現在掌握的早期華南姓氏資料雖然不多，但要全部羅列，也會過於繁雜。此表對本文所探討的東南以外地域的資料，僅部分呈現，目的在展示華南姓氏的大略樣貌。

從附表一看來，華南姓氏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形態。第一，有些姓氏有地域的獨特性，具體來說，各地都有不見或少見於其他地區的姓氏。以下是幾個明顯的例子。湖南長沙及其附近的大姓烝就很獨特，該地還有一些他地罕見的較小姓氏，如這、逢（未收入附表）。[67]江西也有特殊姓氏，如湛（諶）、修（脩）、喻、危、淡。由於資料有限，以上所舉例子未必完全正確，但這裡想指出的是，獨特姓氏是重要現象，它們可能是土著自創，或雖從外來但為土著所特愛的姓氏，可以做為追溯或判斷原住人群的標記（markers）。以前舉姓氏為例，長沙大姓中的烝姓顯然出自今湖南衡陽一帶的地名，該地有河流烝水（又名承水，今名蒸水），有行政區域烝陽、臨烝。[68]在江西方面，脩、修為臨川郡、廬陵郡大姓，臨川之北的豫章郡（郡治在今南昌）有河脩水，脩水中游有縣永脩，脩（修）姓可能也出於河名。[69]更有趣的是，南朝有人姓東陽，如撰有《齊諧記》的南朝宋東陽无（無）疑，應該就是東陽郡人以郡名為姓。東陽郡治在今浙江金華，孫吳於公元 266 年所設，可見有東南土著得姓甚晚。[70]

第二，早期華南也有遍布各地的姓氏，其中最常見的是黃，即使就當前斷簡殘篇所見，從湖南到福建，無處不有。另外如周、陳、吳見於

67 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24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頁 25-26。

68 王子今、馬振智，〈烝姓的源流——讀《嘉禾吏民田家莂》劄記〉，《文博》2003 年第 3 期（西安），頁 46-49。

69 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10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81-90，特見頁 83、88、90。

70 南朝宋東陽无（無）疑撰有《齊諧記》，該書多記東陽郡事。見李劍國輯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536；魯迅，《古小說鉤沈》，收入《魯迅全集》（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第 2 卷，頁 231-23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大部分主要地區，胡、朱、張傳布也很廣。華南何以會有遍布各地的大姓？這裡可以提出的是，4 個最普遍的姓氏（黃、周、陳、吳）之中，除了吳，都是土著性格極強的姓。其中以黃和陳最突出，幾乎所有的原住人群中都有（見附表二）。普及程度較次的姓氏中，張的土著色彩也很強，獨不見於形跡最隱晦的溪人。華南很早就存在遍見各地的姓氏，原因何在，是否有少數姓氏在土著世界中大量傳布，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三，在獨特與遍布各地的姓氏之外，還有區域性比較明顯的姓。以胡為例，這個姓氏雖然出現在不少地方，但最主要還是分布於江西，是該地的大姓，從北部的豫章郡到最南的南康郡都有。[71]另如熊姓，從漢末以降都是豫章郡大姓；區（讀若歐）則在今湖南南北都很醒目。[72]姓氏的區域性所呈現的，顯然是特定範圍的姓氏傳播現象，我們可以考慮這類情況的特點、機制及其涵義。

至於附表二，則是根據學者研究所得，蒐羅漢至隋的華南土著姓氏，其中有些資訊是否準確，尚待細考，但大體可從。這個表中的姓氏展現了兩個主要現象。首先，有幾個姓氏遍布於各原住人群，除了前面提及的黃、陳、周、張，李也很普遍，見於多處的蠻，俚人中也常有。其次，有若干姓氏主要出現在特定人群——雖然有些人群，如蠻、俚，分布地區很廣，內部成分可能很複雜，絕非單一族群。舉例而言，譚（覃、潭、鐔）、向、田、文、魯、梅、樊、冉是蠻人大姓，其中梅氏、向氏、田氏、冉氏尤其分布廣，擁有強大的部族力量；冼（冼）、馮、鍾等則為特見於俚人的主要姓氏。又如，史籍中南朝陳和中唐都有黃洞或黃洞蠻，

71 梁洪生，〈考古資料中的唐以前江西姓氏考察〉，《江西文物》1991 年第 2 期（南昌），頁 76；魏斌，〈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圍繞胡、鄧二氏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9 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 80-91。

72 關於熊姓，見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頁 82-86。區姓見本文附表一第一、二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不同地域，所謂「黃洞」，就是以黃為姓的部族。[73]簡言之，由於漢唐之際的華南遍布尚未華夏化或華夏化程度尚淺的原住人群，這些人群又往往使用特定的姓氏，有的為漢人常姓，有的則罕見於漢人或為土著所自創，探討華南姓氏時，也應當留意它們的族群關聯。

綜合而言，從以上對早期華南姓氏的一般觀察，我們看到了幾個主要問題：姓氏的獨特性、遍見性、區域性與土著性。這幾個現象的發掘將有助於以下對於東南人群的討論。

（二）皖南、浙西姓氏

現在進入安徽南部與浙江西部姓氏的問題。如本文起始所云，這個地區主要指安徽在長江以南部分的山區，但也包含浙西一小塊，約略相當於漢代丹陽郡的南半，或西晉宣城郡的大部與新安郡，核心地帶為後世的徽州，也就是前節所指的山越核心區（參見附圖一、五、六）。在開展討論之前，要說明一點，由於目前所見早期東南人群姓氏不多，資料的樣本代表性不明，如果考察全部已知姓氏，將繁雜而重複。我要做的，是提出相當數量能取得比較具體認識且有形態意義的事例，每一地區都依照這個方式處理，看能歸結出怎樣的推論。

以下討論本地區若干姓氏：

一、周。在早期華南，周是遍布各地的姓，土著中亦常見，在本區的周姓資料中，也有確知為山越者。[74]漢代以降，周是非常普遍的華夏姓氏。就《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所見，在北方，周姓分布大多偏東，即後世河南東半、山東、安徽至江蘇北部一帶，但北方其他

73 見《陳書》，卷 11，〈淳于量傳〉，頁 180；卷 25，〈孫瑒傳〉，頁 319；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憲宗皇帝紀〉，頁 209；卷 8，〈穆宗皇帝紀〉，頁 222、225-226；卷 8，〈敬宗皇帝紀〉，227-228；卷 222 下，〈南蠻下・西原蠻〉，頁 6329-6332。《陳書》中的黃洞在今廣東北部，中唐的黃洞則約在今廣西西南部。

74 《三國志》，卷 64，〈諸葛恪傳〉，頁 1431（周遺）。另一周姓資料見《晉書》，卷 70，〈鍾雅傳〉，頁 1877（周玘）。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域乃至蜀地也有。至於南方，以東部為多，長江下游南北都有周姓，如孫吳大將周瑜就是今安徽舒城人，吳晉之際的周處則為今江蘇宜興人。史籍中的人物絕大多數屬於統治階層，何人進入史籍，也有偶然因素，有關他們的訊息不足以作為社會一般狀態的代表，但《漢書》等仍然透露，黃河下游往南至長江下游流域有許多周姓人群。[75]此外，墓葬磚文中也見到西晉時浙江餘姚有周姓人士。[76]從地緣關係看來，本區土著中的周姓可能主要得自附近的華夏地區，少數或許是從鄰接（如江西）原住人群中傳來的。[77]整體而言，本區的周姓是姓氏區域現象的一部分，也可能有土著性格。

另外要說明，早期中國平民的名字可能最集中見於居延漢簡。不過，簡中籍貫訊息甚少，而且居延是邊陲屯戍之地（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帶），有籍貫資料的吏員戍卒大多來自附近的河西走廊，河西原非華夏地，公元前 121 年始為漢武帝所征服，該處漢人居民幾乎都是新近移民及其後裔，他們的姓名也無法透露北方姓氏的分布狀態。對於這批資料，本文只能偶爾利用。[78]

二、陳。陳的分布形態與周相似。陳姓在華南很普遍，土著中分布尤廣，本區陳姓資料中，也有確知為山越者。[79]在全國範圍內，依早期史籍所見，陳是華夏大姓，分布遍於北方各地以及長江中游、蜀地，似

75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人物出身資料可在以下工具書中快速尋得：倉修良主編，魏得良、王能毅副主編，《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後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三國志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

76 餘姚梁輝鎮九頂山西晉武帝太康八年（287）墓有磚銘：「會稽孝廉故郎中周君都船君子也」，意思不甚清楚，或許是周都、周船父子的墓。見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碩士論文，2017），頁 98。

77 參見本文附表二第七欄。

78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就籍貫資料所見，簡中所記大部分人來自居延所在的張掖郡。

79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8（陳僕）。另一陳姓資料見《晉書》，卷 29，〈五行下〉，頁 906（陳焦）。另參本文附表一、二。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乎比周姓傳衍更廣，長江下游南北也相當多，特別是當今之皖北、蘇北、浙北。和周姓一樣，本區陳姓可能同時得自附近的華夏地區以及周邊之土著。

三、吳。這也是華夏常見姓氏，鄰近本區的贛北、浙北、蘇南、蘇北都有此姓。吳姓極早就進入東南原住人群。公元前 2 世紀末，漢武帝時，東越國（由閩越分出）有貴族名為吳陽，這是東甌、閩越統治集團中罕見有漢式姓名者。吳陽曾經入漢，他使用華夏式姓名，不知是否與此有關。[80]更早，在今江西北部號稱「番君」（鄱君）的吳芮（?-201 BC）（秦鄱陽令、漢長沙王），於秦漢之際「率百越佐諸侯」，也有土著色彩。[81]皖南的吳姓可能華夏與周邊土著的來源都有。[82]

四、方。方姓出現甚早，漢昭帝始元三年（84 BC）的居延漢簡即有張掖觻得人方子惠，史籍中也有 2 位西漢至新莽時方姓人士，分別出身今陝西、山東。[83]不過整體而言，在秦漢與中古中國，方姓罕見，而且就現有資料所見，約半數出於皖南山地和周邊地區。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方姓知其背景者僅有 3 位，一是丹陽郡歙縣人，一是江西中部人（廬陵郡），一是閩北人（建安郡）。最後一位（山酋方善）顯然是土著，後漢歙人方儲（?-93）是士人，但家鄉就在山越核心區，大概是華夏化的土著。[84]此外，浙江淳安（新安郡遂安縣）有東晉海西公太和三

80 關於東南土著中吳姓的討論，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 232。吳陽事見《史記》，卷 114，〈東越列傳〉，頁 2983；《漢書》，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閩粵〉，頁 3862-3863。

81 《史記》，卷 7，〈項羽本紀〉，頁 316。另見《漢書》，卷 34，〈吳芮傳〉，頁 1894-1895。

82 皖南山地吳姓見《梁書》，卷 15，〈謝覽傳〉，頁 265；卷 21，〈蔡撙傳〉，頁 333；《南史》，卷 29，〈蔡撙傳〉，頁 775（吳承伯）。

83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頁 12（方子惠）；《漢書》，卷 19 下，頁 844（方賞）；《後漢書》，卷 1 上，頁 18；卷 11，頁 473（方望）。如前所述，方子惠應為新近移民或其後裔。

84 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2 版），卷 28，木部「松第十三・事對・棲鸞繫馬」，頁 686 引謝承《後漢書》；《太平御覽》，第 4 冊，卷 411，〈人事部五二〉，頁 408 引謝承《後漢書》（方儲）；《南齊書》，卷 18，〈祥瑞〉，頁

臺灣大學圖書館

年（368）的方家墓葬。[85]根據以上訊息，南齊宦官方佛念應當也是東南本地人。[86]至於隋唐，方姓者仍蹤跡寥然，目前搜得知其出身地者 8 人，其中 2 位出於皖南、浙西的山越故地，1 位來自附近的杭州，另有 4 位零星分布於華北和華中，還有 1 人是西原蠻（在今廣西西南）。[87]很明顯，雖然可能由北方傳來，本區為方姓的集中地，在本區及其周邊，這是土著色彩頗強的姓氏。

五、留。這是東南的特殊姓氏，或許為土著所自創，留待有關浙江中南的部分討論。

六、向。向是著名的蠻人大姓，從長江中游原住人群傳播至此的可能性相當高。[88]

七、金。在秦漢與中古，金是罕見姓，魏晉南北朝及其前見於史籍者，幾乎全部集中於西北，而且多為胡人和羌人，隋唐以後則以新羅人

363（方元泰）；《梁書》，卷 21，〈孫僉傳〉，頁 327（方善）。

85 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7。

86 《南史》，卷 77，〈恩倖傳・茹法珍〉，頁 1935。

87 出身皖南、浙西山地者有方清和方良琨。前者見《舊唐書》，卷 132，〈李艽傳〉，頁 3654；《新唐書》，卷 41，〈地理五〉，頁 1067；獨孤及，〈賀袁傪破賊表〉，收入《毘陵集》（四部叢書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卷 4（董誥等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 影印〕卷 384）。後者見《冊府元龜》，卷 140，〈帝王部・旌表第四〉，頁 1690-2；卷 804，〈總錄部・義第四〉，頁 9559-2；《新唐書》，卷 195，〈孝友傳〉，頁 5577。方清為代宗朝（762-779）前期皖南「山賊」，頗見於史籍。方氏出於杭州者見《新唐書》，卷 195，〈孝友傳〉，頁 5576（方宗）。其他地區方姓人士可見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64，〈漁獵篇・引證部・感應緣〉，頁 1918-1919（方山開，亦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點校本〕，卷 132，〈報應三十一〉）；《舊唐書》，卷 53，〈李密傳〉，頁 2218（方獻伯）；《新唐書》，卷 190，〈杜洪傳〉，頁 5485（方詔）；《新唐書》，卷 222 下，〈南蠻下・西原蠻〉，頁 6329（西原蠻首領方子彈）；〈唐故溫縣主簿方君墓誌銘〉，收入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 9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 456（方禮）。

88 此區向姓者見《陳書》，卷 10，〈程文季傳〉，頁 173；卷 23，〈陸繕傳〉，頁 303（向文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主。[89]然而在此背景下，遠離西北的東南亦有金姓，歙縣山越有首領名金奇，[90]金奇以後，晚唐詩人金昌緒為杭州人，另有小說中的中晚唐天台道士金柔。後兩人的地緣關係為浙江中北部，接近皖南。[91]宋元以後，金姓聞名者漸出，大抵為此地區人士，如南宋初金安節（1094-1170）為安徽休寧人，宋元之際理學家金履祥（1232-1303）為浙江蘭溪人，清代金姓知名學者也全都出身這一帶。[92]從上述資訊可以判定，早期皖南金姓是獨特的土著姓氏，與西北金姓無關，此姓人士到很晚才廣見於文獻，正是因為皖南、浙西山區到南宋以後才成為中國文化與經濟核心區的一部分。這項認識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一項南朝資料的涵義，《太平廣記》引《還冤記》云，東晉明帝（323-326 在位）殺死力士金玄，這位力士應該就是東南的原住民。[93]

89 關於早期金姓，以西漢匈奴屠各部金日磾家族最著名，漢末曹操時有京兆人金禕據說是金日磾的後代。見《三國志》，卷 1，〈武帝紀〉，頁 50 注引《三輔決錄》。金日磾家族而外，十六國北魏又多見西北羌、胡以金為姓者，如金豹、金熙、金篡、金大黑、金洛生、金崖。參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286-287；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46-47、279。除上述，西北也有與羌胡無明顯關聯的金姓人士。至於隋唐，金姓多從新羅來，偶見出自西北有胡族背景者。參見〈大唐隋故車騎將軍金公墓誌銘并序〉，收入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永徽 002，頁 132（金行義）。

90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8。

91 計有功，《唐詩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新一版），卷 15，〈金昌緒〉，頁 227；《太平廣記》，卷 49，〈鄭冊〉，頁 305（金柔）。〈鄭冊〉原出《原化記》，作者皇甫氏，名不詳，活躍於唐武宗朝（841-846）前後。參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頁 650。此外，後周廣順二年（951）台州刺史名金訓，當時台州（州治在今浙江臨海）在吳越治下，刺史當為鄰近人士。見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影印嘉慶二十三年〔1818〕宋世犖重刻本），卷 8，〈秩官門一〉，頁 29b（總頁碼 7347）。

92 清代學者資料見嚴文郁編，《清儒傳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115-116。

93 《太平廣記》，卷 119，〈金玄〉，頁 834。東晉史料中有金壹、金符青，亦不無為東南土著之可能。見《晉書》，卷 37，〈濟南惠王遂傳．曾孫勳〉，頁 1103；沈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47，〈劉懷肅傳〉，頁 140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八、祖。山越有名為祖山、祖郎的領袖，可見祖姓在漢末孫吳皖南力量不小，[94]孫吳集團中另有軍將祖茂、祖始，更顯示東南原有祖姓人群。[95]祖姓在早期中國其他地方罕見，但在范陽郡逌縣（今北京西南）則為大姓，4 世紀初永嘉亂時遷至南方的祖逖家族就出自該地，後來的祖沖之（429-500）家族亦屬此系。北朝也有許多范陽祖氏活躍於朝廷和知識界，北齊祖珽家族尤為知名。山越和范陽的祖姓顯然渺不相涉，姓氏相同，應屬巧合。[96]西晉以下至唐末五代，傳世文獻與墓誌中似未見出身皖南及其周邊的祖姓人士，但宋代以後則可見到福建西北的建安、浦城有此姓，如宋人祖吳、祖世英、祖秀實，清人祖之望（1755-1814），他們應該就是源出早期東南祖姓。種種跡象看來，皖南祖姓有濃厚的土著色彩。[97]

九、紀。就文獻所見，皖南紀姓者有東晉宣城人紀世和、陳朝宣城「劫帥」紀機。宣城郡即皖南山地所在，大部分為山區，紀世和似為郡治或附近人，「劫帥」紀機有可能就出於山地。[98]早期中國紀姓資料極少，地域背景又多不明，從僅有訊息看來，似乎多分布在東方從今山東到江南一帶，不知此字之成姓是否與古紀國有關（在今山東壽光）？宣

94 祖山見《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8。祖郎資料較多，可見同書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策〉，頁 1103 裴松之注引《江表傳》、頁 1107 裴注引《江表傳》；卷 50，〈孫賓妃傳・孫破虜吳夫人〉，頁 1195；卷 51，〈宗室傳・孫輔〉，頁 1211。

95 見《三國志》，卷 46，〈孫破虜討逆傳・孫堅〉，頁 1096；《晉書》，卷 3，〈武帝紀〉，頁 69；《太平御覽》，第 2 冊，卷 187，〈居處部十五〉，頁 571 引《吳志》。

96 北朝還有契丹人採用祖姓，可見姓氏為單元傳播的執念一定要避免。見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00，〈契丹傳〉，頁 2224（契丹使者祖真）。

97 宋代以下閩西北祖姓資料可略見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6 增訂二版），第 3 冊，頁 1797-1798；陳壽祺，〈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祖公之望墓志銘〉，收入錢儀吉纂，《碑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93 標點本），第 3 冊，卷 39，頁 1096-1098。祖之望以北宋古文家祖無擇（1010-1085，河南上蔡人）為其先世，事甚可疑。按，有關祖姓或其他特別姓氏的探察，現代人口調查中的姓氏資料應能有所助益，可惜中國官方未公開此類資料，只有粗略的間接報導。

98 紀世和見《晉書》，卷 74，〈桓彝傳〉，頁 1941；紀機見《陳書》，卷 3，〈世祖本紀〉，頁 45、48。紀機後來出任陳朝軍將。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城郡之北的丹陽郡（今南京附近）有紀姓群體，永嘉亂時以江南人士身分支持東晉元帝的紀瞻（253-324）以及南朝齊高帝蕭道成親信紀僧真，皆出於此。[99]紀或可暫視為今蘇南、皖南的區域性姓氏，由此往南傳至山區。

十、沈。隋朝於開皇九年（589）平陳之後，江南大亂，皖南黝縣、歙縣有「賊帥沈雪、沈能」。[100]沈姓罕見於兩漢，漢末以後大出。無論在此之前或其後，絕大多數出於太湖周邊的吳地，特別是武康（今浙江德清）、吳興（今浙江吳興）、吳郡（郡治在今蘇州），武康沈氏尤其活躍於南朝的政軍體系與知識界，北方僅見零星沈姓。[101]很明顯，沈是一個區域性的姓，皖南的沈姓可能來自鄰近的華夏地區。

我們已經分析了早期皖南、浙西的 10 個姓氏，發現以下幾個類型。第一，該地有獨特的姓氏，方、留（下一小節討論）、金、祖屬此。這一類型有些姓氏也見於附近地區，如方、留。這些姓氏有很強的土著性格，東南人群缺乏族稱，我們不妨把這類姓氏當作此地土著實體存在的標記。不過要強調，這並不意味冠有這類姓氏的人就是土著，族群標記（ethnic markers or indicia）和實際的族群性（ethnicity）性質不同，前者是指與族群有關聯的特徵，但不代表具有這種特徵的人一定屬於某一族群，後者是由許多因素所構成的。[102]第二，皖南也有江南的區域性姓氏：紀、沈。由於皖南地近華夏化很早的蘇南和浙北，這兩姓頗可能是從鄰近華夏區傳過來的，可以視為華夏化力量的痕跡。第三，吳姓自成

99 參見《晉書》，卷 65，〈王導傳〉，頁 1745-1746；卷 68，〈紀瞻傳〉，頁 1815-1824；《南齊書》，卷 56，〈倖臣・紀僧真〉，頁 972-974。

100 《隋書》，卷 48，〈楊素傳〉，頁 1284。

101 劉宋大將沈慶之、文學大家沈約、經學大家沈文阿與沈重均為武康沈氏。沈姓北人很難看到。十六國時前涼官吏沈猛應該是北方人，北魏另有兗州人（州治在今山東濟寧）沈法會，隋有東海郡人（郡治在今連雲港）沈覓敵。見《晉書》，卷 86，頁 2244；《魏書》，卷 91，頁 1965；《隋書》，卷 4，頁 91。

102 族群標誌和族群性區別的說明，可見 Erica Brindley, “Barbarians or Not? Ethnicity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Ancient Yue (Viet) Peoples, ca. 400-50 BC,” *Asia Major* 16, no. 1 (2003, Taipei), p.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格，這雖然是普通的漢姓，但很早就傳入東南土著世界，可能華夏與土著的來源都有，也許華夏的影響強一些。第四，向也是特殊情況。向是長江中游的蠻人大姓，應該是從該處傳來的。這個姓氏顯然反映了華南土著圈的內部交通與流動。第五，周和陳是漢人與華南土著都常見的姓，但由於本區接近華夏地區，而當地又多周姓和陳姓，這兩姓應該主要來自華夏的影響。

以上是探討皖南若干姓氏所歸納出的要點，其中大部分都會在對其他東南地區姓氏的考察中繼續檢證。這裡先簡單提出兩個進一步的看法。首先，上文已指陳，皖南山區有土著色彩濃厚的姓氏，這類姓氏是從何而來呢？就資料顯示，有可能是土著自創，而與他方姓氏暗合，另一可能則是取自已知的漢姓但在土著群中特為流傳。其次，皖南山地的姓氏也有明顯傳自鄰近華夏地區者，如紀、沈、周、陳，這些姓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為當地人口中華夏移民成分的反映，但也不宜完全如此理解，它們也很可能是文化傳播的一環——土著依照這些姓氏取姓。接下來，要考察浙江中南部的姓氏。

（三）浙江中南部姓氏

現在進入浙江中南的部分。這個地區是以孫吳末至東晉初的東陽郡和臨海郡（即東晉南朝東陽、臨海、永嘉三郡）來界定的，也就是約今東陽、天台一線以南，錢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以東的浙江地區。此地多山，直到漢末，郡縣化程度很低，是邊陲外的邊陲，但金衢盆地華夏化較早。（參見附圖一、六）。

以下討論本地區若干姓氏：

一、黃。黃是華夏早期重要姓氏，自西徂東，從北到南，分布非常廣。就本文主題而言，值得提出兩點。首先，也許和河南南部古代有黃國有關（在今河南潢川），黃姓在今河南南部、漢水流域、長江中游一帶似乎特別多。其次，前文已提過，黃姓在華南分布極廣，而且遍見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陸土著人群，這個現象可能導源於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的黃姓。此姓從長江中游透過縱貫南北的大河如湘江、贛江及其支流流傳到南方各地，舉例而言，早在漢武帝時，就有今廣西、越南北部一帶的甌駱將領名叫黃同。[103]偏東的淮南、江南吳越之地也有黃姓的蹤影，淮南如東漢後期參與民間起事的九江人（郡治在今安徽定遠）黃虎、廬江人（郡治在今安徽廬江）黃穰，江南則有東漢大臣黃昌（今浙江餘姚人）、漢末起事的黃龍羅（今浙江紹興人）。[104]至於浙江中南部，可見東漢臨海章安小吏黃他；瑞安南朝宋元嘉九年（432）磚上有人名「黃賀」；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中則有烏傷民（今浙江義烏）黃蔡。[105]此外，吳大帝孫權赤烏五年（242），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為亂，有名為黃亂的首領。[106]這三郡大抵是現在皖南、江西與浙江交界至閩西北一帶，也涉及本文目前處理的地域。浙江中南部的黃姓應該是同受北面的江南與西側的江西影響而出現的。這是既遍布全國又很早深入華南的姓氏。

二、朱。以目前所見，隋以前的浙江中南部人名資料中，傳世文獻得 3 例：東陽郡 2 例，一不知縣名，一在郡治長山縣（今金華）；永嘉郡治永寧縣（今溫州）1 例；[107]磚文亦得 4 例。[108]現存中古及其前的浙

103 《史記》，卷 20，〈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1052；《漢書》，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 657；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閩粵〉，頁 3863。

104 《後漢書》，卷 6，〈沖帝紀〉，頁 276；卷 38，〈滕撫傳〉，頁 1279（黃虎）；卷 31，〈陸康傳〉，頁 1114；卷 86，〈南蠻傳〉，頁 2841（黃穰）；卷 77，〈酷吏列傳・黃昌〉，頁 2496-2497（黃昌）。《三國志》，卷 55，〈董襲傳〉，頁 1291（黃龍羅）。

105 《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24（黃他）；孫詒讓，《溫州古甓記》（民國間鉛印本），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下冊，，頁 19a，總頁碼 563（黃賀）；《太平御覽》，第 3 冊，卷 350，〈兵部八一〉，頁 1051 引《異苑》（黃蔡）。

106 《三國志》，卷 60，〈鍾離牧傳〉，頁 1393。

107 《南史》，卷 77，〈恩倖傳・朱幼〉，頁 1920（東陽朱幼）；《太平廣記》，卷 318，〈朱彥〉，頁 2515（永寧朱彥，原出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太平御覽》，第 7 冊，卷 757，〈器物部二〉，頁 94 引《異苑》（長山朱郭）。

108 黃瑞，《台州甎錄》，卷 1，頁 14a（一例），收入氏編，《台州金石錄》（民國五年嘉業堂鉛印本），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術資料庫

江中南人名極少，朱姓 7 例頗特殊，或可推測朱姓在該地人數眾多。就史籍所見，朱是中國姓氏普遍化後的一個早期主要姓氏，遍見於各地，今河南、山東、蘇北尤其多，來源應非單一。[109]早期朱姓的一個特點是，東南也是集中區，長江下游南北均有，西漢朱買臣即是蘇州人，今浙江北部錢塘江兩側亦多。[110]浙江中南接鄰浙北，此地存在朱姓人群，當是北來文化傳播與人民移居的因素兼而有之。這可以算是一個區域性的姓氏。

三、王。就史籍所見，在漢代和三國，王是分布最廣的姓氏之一，儘管傳世的樣本有限，我還是願意猜測，這是流行最廣的漢式姓氏。王姓不但見於華夏本部各地，在華夏化程度很低的邊郡乃至域外都可以見到。舉例而言，漢初韓王信（?-196 BC）部將中就有胡人王黃；[111]東漢至三國，樂浪郡（郡治在今北韓平壤）和玄菟郡高顯縣（今遼寧鐵嶺）都有王姓的本地人，烏桓中也有人採用此姓。[112]這種形態的分布，不可

總頁碼 242；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 1，頁 5a（一例），收入氏編，《台州金石錄》，《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63；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5（二例）。

109 舉例而言，山東多朱姓，可能與該地古有邾國（邾婁，在今鄒縣一帶）和朱虛縣（在今臨朐）有關，因地得姓。

110 朱為東南顯姓之事，已為唐宋姓氏學者所認識。見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以下簡稱《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2，頁 253-256；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影印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卷 3，姓氏條，頁 23、26（總頁碼 6772-6773）。姓望為中古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意思是某地之望姓，相關資料不少。利用這類資料研究姓氏現象有其危險性，但有時仍具參考價值。

111 略見《史記》，卷 93，〈韓王信列傳〉，頁 2631-2635；卷 95，〈樊噲列傳〉，頁 2657。

112 樂浪「土人」王調見《後漢書》，卷 1 下，〈光武帝紀〉，頁 49；卷 76，〈循吏列傳・王景〉，頁 2464。玄菟郡高顯縣民王簡見《三國志》，卷 4，〈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頁 139。烏桓人王姓者可見《三國志》，卷 26，〈牽招傳〉，頁 732（王同、王寄）；卷 30，〈烏丸鮮卑東夷傳・烏丸〉，頁 835（王護留，另見卷 3，〈明帝紀〉，頁 109；卷 28，〈毌丘儉傳〉，頁 762）。這幾位烏桓人都與中國羈縻體制有關聯，或許因此需要漢式姓名。此外，漢武帝時朝鮮有將軍王唅，不確定是音譯名或是漢式姓名。見《史記》，卷 115，〈朝鮮列傳〉，頁 2988；《漢書》，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朝鮮〉頁 3867。

臺灣大學圖書館

能單憑移民即可導致。王姓穿透力如此之強，或許是因為字形和發音都簡單，意思也好，當人們需要姓氏或漢式姓名時，樂於採用此字。在華夏區域中，王姓似乎在今日的山東特別多，東南雖非集中區，也頗有此姓，東漢初年思想家王充（27-97）即是會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在浙江中南，目前磚文得見南朝 5 例；[113]劉宋鄭緝之《東陽記》載，東晉時信安縣（今浙江衢州）有民王質，所涉雖然是志怪性質，亦可為王姓存在該地之佐證。[114]此外，南朝末期福建南部有王姓大族，也契合本條所說的情勢。[115]由於王姓分布特廣，傳播方式也未必有待移民，浙江中南的王姓應該有土著成分。

四、許。許是早期中國大姓，漢代三國已分布甚廣，但就資料所見，似乎主要在東半部，即當今之河南、河北、山東、蘇北、皖北，長江三角洲也頗常見，太湖周邊的吳地和錢塘江東側的越地都有。[116]至於浙江中南部，在隋以前的傳世文獻，有東晉前期東陽郡吳寧縣（今浙江東陽）的許孜、許生父子；臨海東晉南朝磚文中則有兩位許姓，一位沒有記名，一位叫許道。[117]浙江中南的許姓當是從北邊的蘇南、浙北傳來，但吳越

113 黃瑞，《台州甎錄》，卷 1，頁 20b；卷 3，頁 9b；卷 4，頁 1b、10b、15b，分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254、332、366、384、394。

114 王質見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 40，〈漸江水〉，頁 3293 引。這個故事也數見於《太平御覽》，文字皆略有不同，見第 5 冊，卷 579，〈樂部十七〉，頁 521；第 7 冊，卷 763，〈器物部八〉，頁 140；第 8 冊，卷 965，〈果部二〉，頁 688。《東陽記》作者與內容的討論，見鮑遠航，〈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考述〉，《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 年第 4 期（金華），頁 84-88。

115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9），頁 216-222。

116 漢代三國吳地的許姓有 8 例（其中 6 例屬許荊家族），會稽郡北部有 2 例（許生、許昭父子，又稱許昌、許詔），東晉以下其例更多。參見《後漢書》，卷 58，〈臧洪列傳〉，頁 1884；卷 76，〈循吏列傳・許荊〉，頁 2471-2472；《三國志》，卷 7，〈呂布臧洪傳〉，頁 222；卷 46，〈孫破虜討逆傳〉，頁 1093、1105、1109。

117 《晉書》，卷 88，〈孝友傳・許孜〉，頁 2279-2280；黃瑞，《台州甎錄》，卷 3，頁 21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355；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 1，頁 7b-8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68-469。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

的許姓顯然又是傳自長江以北。

五、徐。徐是早期中國大姓，兩漢三國時已遍布各地，西北、山西、河北、河南、四川等都有，但似乎以東方特多，如今山東、蘇北。東南也有，今蘇南、浙北、贛北皆可見。至於浙江中南部，中古史籍中所記，集中於東陽郡太末（今浙江龍游及周邊）；[118]孫吳兩晉磚文則見 3 例，一在臨海，一在黃巖，一在瑞安。[119]值得一提的是，後漢有名為徐登的閩人，可見徐姓入東南早而深。[120]徐姓明顯是從華夏地區傳來，顯然既有移民的因素，也有土著冠姓的成分。

六、任。任是早期中國大姓，分布非常廣，兩漢時已遍見華北各區域。華北之外，巴蜀非常多，蘇皖淮南地、江南也都有。[121]至於浙江中南部，則有兩晉之交的臨海章安任訪、任旭、任琚祖孫三代，約略同時的任顒也是臨海人。[122]磚文則有 3 例，時間在東晉南朝，地點分見金華、瑞安、仙居。[123]顯然，此地任姓是由北邊的華夏區傳來，和前條徐姓性質相似。

---

118 《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23、1324 裴松之注引《會稽典錄》（徐陵、徐平父子）；《南齊書》，卷 54，〈高逸傳．徐伯珍〉，頁 945-946（徐伯珍）。

119 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 1，頁 3b-4a（徐道周），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60-461；孫詒讓，《溫州古甓記》，頁 7（徐弘），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下冊，總頁碼 539；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4（徐□）。

120 《後漢書》，卷 82 下，〈方術列傳．徐登〉，頁 2741。徐登是巫師，大概來自今閩北、浙南一帶。

121 早期江南任姓有：東漢句章（浙江餘姚）任奕及鄞縣（浙江寧波）任光、東晉暨陽（江蘇江陰）任谷、南朝梁建康（南京）任提女。三國吳有將領任度，或許也是江南或淮南人士。見《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25-1326；卷 64，〈孫綝傳〉，頁 1447；《晉書》，卷 72，〈郭璞傳〉，頁 1908；《隋書》，卷 25，〈刑法志〉，頁 700。

122 《晉書》，卷 94，〈隱逸傳．任旭〉，頁 2438-2439；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 影印本），〈政事第三〉，第 12 條，頁 175。

123 黃瑞，《台州甎錄》，卷 2，頁 12b-13b，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288-290；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4、9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七、陶。中古資料中，浙江中南部有南朝宋大明八年（464）臨海磚文所記「陶□先」，隋代則有「東陽賊帥」陶子定。[124]陶姓在兩漢和中古文獻一直不多見，雖然北方也有，絕大多數集中於長江下游南岸的江西九江至江蘇南京一帶，如陶侃（267-332）出身鄱陽郡，後徙尋陽柴桑（今九江），陶弘景（456-536）為丹陽秣陵人（今南京），浙江中南部的陶姓顯然由其西面和北面傳來，可視為區域性姓氏。[125]但由於陶姓集中於長江南岸，北方陶姓來源未必與之相同，陶姓也可說具有江南土著色彩。

八、留。留姓罕見，漢代至南北朝，史籍中主要有兩批人。一批是西漢劉邦功臣集團中的彊圉侯留𨒫（《史記》作留勝）及其子孫。[126]留𨒫是何處人，並不清楚，不過劉邦家鄉附近有名為「留」的地方（在今江蘇沛縣），曾置縣，留侯張良所封即在此，不知留𨒫是否也是這一帶人？[127]至於其他留姓，基本上都出自東南，特別是浙江中部。三國孫吳有武將留贊（183-255）、留略（?-279）、留平（?-272）父子為會稽郡長山縣人（今浙江金華）。[128]東晉武將留寵為東陽人（東陽於 266 年設郡，原為會稽郡之一部分，郡治在長山），南平太守留叔先撰有《東陽朝堂像讚》，自然也是當地人。[129]南朝宋劉敬叔《異苑》中有人物留元寂

124 黃瑞，《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卷 1，頁 7b，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68；《隋書》，卷 47，〈韋世康傳〉，頁 1270；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4，〈韋孝寬傳〉，頁 2275。

125 由於出身地集中，陶姓人物主要見於東晉和南朝相關史籍，在其他文獻都非常零散。如東漢有今河南滎陽人陶敦，隋代有長安人陶模，見《後漢書》，卷 6，〈順帝紀〉，頁 251；《隋書》，卷 71，〈誠節傳・陶模〉，頁 1642。

126 《漢書》，卷 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 589。另參《史記》，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頁 942。

127 參考《史記》，卷 55，〈留侯世家〉，頁 2042；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 8，〈濟水二〉，頁 784-785；《太平寰宇記》，卷 15，〈河南道十五〉，頁 301。

128 主要見《三國志》，卷 64，〈孫峻傳〉，頁 1445 注引《吳書》。

129 留寵見《晉書》，卷 81，〈蔡豹傳〉，頁 2112；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 31，〈妖怪・引證部・感應緣〉，頁 981。留叔先及其著作見《隋書》，卷 33，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長山人；[130]至梁陳之際，長山人留異（?-564）「世為郡著姓」，崛起鄉里，成為東陽武裝領袖。[131]凡此種種，可見留姓在金衢盆地頗具勢力。此外，孫吳有將領留慮、留憲，大概都是東南本地人；東晉成帝咸康八年（342）有春穀縣民留珪的紀錄，春穀近今安徽蕪湖，在長江南岸。[132]南宋沈作賓修《嘉泰會稽志》，把「留」列為會稽重要姓氏之一，可以支持以上的發現。[133]現存隋唐資料幾乎不見留姓，知其鄉里者只有 2 位俗姓為留的天台宗僧人：慧（惠）威（活躍於 7、8 世紀之交）、廣修（771-843），都是東陽人。[134]五代至宋所知留姓則大都為福建中南部人，主要是五代晚期統治泉漳的留從效（効）（906-962）族人及其後裔。不過，以降事蒙元並勸降文天祥（1236-1283）留下惡名的留夢炎（1219-1295）則是浙西衢州人。[135]根據以上所述，「留」可以說是東南——特別是浙江中南部和福建——的特有姓氏，應可視為土著的標記。

〈經籍二〉，頁 975。《新唐書・藝文志》亦載此書，唯書題作「東陽朝堂書讚」，「書」當為「畫」之誤。見《新唐書》，卷 58，〈藝文二〉，頁 1480。

130 《太平廣記》，卷 442，〈留元寂〉，頁 3615。

131 留異為梁陳之際重要人物，本傳見《陳書》，卷 35，〈留異傳〉，頁 483-486。

132 留慮見《三國志》，卷 58，〈陸遜傳〉，頁 1356。留憲見《晉書》，卷 3，〈武帝紀〉，頁 71；卷 34，〈杜預傳〉，頁 1028；卷 42，〈王濬傳〉，頁 1209。留珪則見《宋書》，卷 29，〈符瑞下〉，頁 851。春穀為江左舊縣，前漢時已有，但《宋書》皆作「舂穀」，不知何故，現仍用其舊。又，《宋書・州郡志》已無春穀縣，當是為僑縣繁昌所奪，目前繁昌縣仍在。以上所述參見《宋書》，卷 29，〈符瑞下〉，頁 851-852、868；卷 35，〈州郡一〉，頁 1033-1035。

133 《嘉泰會稽志》，卷 3，姓氏條，頁 23（總頁碼 6772）。

134 慧威與廣修分見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點校本），卷 6，頁 116；卷 30，頁 742。兩人後來都被尊為天台祖師。

135 傳世文獻中，五代、兩宋留姓基本訊息見於以下資料：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0-1990）；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值得注意的是，宋初有留福為徐州人，這似乎意味，北方的留姓確實和留地有關。（「留」在徐州，宋時當地有留城鎮。）見舊題曾鞏，《隆平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7，〈留福〉。

臺灣人類學期刊

九、章。早期中國章姓罕見，秦代章邯雖然大名鼎鼎，但不知出身何方。關於章姓最能確定的是，東南為其集中地。東漢順帝陽嘉元年（132）有章何（或作章河）起亂於「揚州六郡」。[136]兩晉南北朝以下，章姓人士頗見於蘇南和浙北，如西晉初會稽永興（今浙江蕭山）有女巫章丹，陳朝重臣章昭達（518-571）則為吳興武康人（在今浙江德清）。[137]至於浙江中南部，目前在磚文中查得兩晉 4 例；[138]此外，南朝宋《異苑》中有臨海樂安章汎（今浙江仙居）。[139]到了唐代，章姓仍不多見，而以東南為大宗，其中有 2 位睦州人：高宗永徽四年（653）與睦州女子陳碩真（620-653）一同起事的章叔胤（?-653）、詩人章八元（771 年進士）。[140]唐代的睦州在金華西北，大部分為今浙西山地，屬於上一小節所論的地域，非常接近本區。宋代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提到了唐代文獻中的章氏四望：吳興、濮州武陽郡、泉州南安郡、洪州豫章郡。四望之中，3 個在東南。[141]就浙江中南而言，章氏可以歸為區域性姓氏，當主要由其北面諸地傳來。

十、虞。虞為華夏舊姓。史籍之中，虞姓在兩漢三國主要見於兩處，

136 《後漢書》，卷 6，〈順帝紀〉，頁 260；志十一，〈天文中〉，頁 3244。

137 《晉書》，卷 94，〈隱逸傳・夏統〉，頁 2428；《陳書》，卷 11，〈章昭達傳〉，頁 181-185。

138 黃瑞，《台州甎錄》，卷 1，頁 18，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249-250（西晉，出於臨海，章祿）；卷 3，頁 10a-12a、18b-19b，總頁碼 333-337、350（東晉，出於臨海，應為製磚家族：章孟高、章孟達、章孟榮、章孟山、章孟蛾）；孫詒讓，《溫州古甓記》，頁 3b-4a（西晉，出於瑞安，章恨），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下冊，總頁碼 532-533；頁 8b-9a（東晉，出於瑞安，章洋），總頁碼 542-543。

139 《太平廣記》，卷 386，〈章汎〉，頁 3076-3077。

140 關於章叔胤，見《新唐書》，卷 109，〈崔義玄傳〉，頁 4095；《資治通鑑》，卷 199，〈唐紀十五〉，頁 6282。章八元事蹟則可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4，頁 109-113（儲仲君撰）。

141 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卷 13，頁 191。氏族譜與姓氏書中姓望的涵義不可一概而論，這裡是以此指出，唐代所認知的章氏顯族多在東南，可進一步證實東南為章姓的集中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是後世的河南東部，另一則是浙江餘姚。中古以下仍大抵如是，除此兩地，以山東南部較多見，其他地方則甚零星。唐宋郡望資料中，虞姓有兩望：陳留（或稱濟陽）與會稽，恰巧反映了這個情況。[142]東南虞姓幾乎都見於餘姚，應該只意味當地的虞姓為強族，能見度高，附近地區亦應有此姓，東晉時丹陽江寧（今南京西南）即有百姓名叫虞由。[143]南方的虞姓與北方此姓未必有關聯，東南虞姓或許源於地名，餘姚鄰縣就是上虞。[144]其實，河南虞姓也可能和地名有關，秦漢在今河南省東端置虞縣（今虞城縣），可見這裡有虞地。[145]漢末至南朝，餘姚虞氏人物輩出，如三國吳學者虞翻（164-233），南朝末至隋唐之際文士虞荔（503-561）、虞世基（?-618）、虞世南（558-638）父子；浙江中南虞姓則僅一見，即三國吳時鄱陽太守虞翔，他是章安人，在今浙江臨海。[146]浙江中部距位於杭州灣南岸的餘姚、上虞不遠，虞姓當是傳自該地，其中應該有移民的因素。虞可以算是區域性的姓氏，但在東南，此姓似集中於錢塘江之東的越地，這裡的華夏化較蘇南、浙西吳地為晚，或可推測為古代越人自創的漢姓。

---

142 陳留郡在今河南開封南北約 100 公里一線以東至山東省界。西晉惠帝時割該郡之一部為濟陽國，後為郡，故此兩望可視為同一望。見《宋書》，卷 35，〈州郡一〉，頁 1046。有關虞姓的唐宋郡望資料，可見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第 42 卷第 3 號（1959 年 9 月，東京），頁 60-61、64、78、82、94；《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2，頁 228-229；敦煌寫本北圖位字 79 號〈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收入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 1 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85-86、95-96。另外值得一提，中古北方虞姓尚有中亞魚國人士後裔，除了因墓葬而知名的北周楊隋虞弘，同時期的虞慶則原本也姓魚。見《隋書》，卷 40，〈虞慶則傳〉，頁 1174。虞慶則後世的家狀稱其先人是從會稽遷來的，也是攀附著望的趣事。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2，頁 229。

143 《宋書》，卷 29，〈符瑞下〉，頁 851。

144 「虞」和餘姚的「餘」雖然現在同音，在上古音，子音則相去甚遠。東南「虞」姓如果源自地名，應該不是餘姚、餘暨、餘杭的「餘」。

145 傳說這一帶是少康失國奔有虞氏的所在，未必可信。

146 《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一、斯。斯是罕姓中的罕姓，史籍中卻有兩位漢末此姓人士，一是前文提過為「山越所附」的會稽剡縣豪強斯從，另一則是大約同時的會稽吳寧（近今浙江東陽）縣民斯敦。[147]這是中古及其前僅有的知其出身地域的斯姓人物，事實上，斯姓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幾乎不見蹤影。[148]由此可以判斷，這個姓氏就是在今浙江中南部或稍北地區形成的，南朝梁有太樂丞斯宣達，應該也出於此處。[149]斯姓原為東南土著姓氏，可以無疑。斯姓形成很早，為什麼人數一直如此少，傳布如此不廣？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此姓過於特殊，看起來華夏性太低，很少人願意歸附。

十二、駱。在漢代與中古文獻，駱姓不多見，但明顯出現於兩個區域：西北（陝西、甘肅）和東南吳越之地。東南部分，以西晉行政區為準，見於吳興郡長城（今長興）和臨安（今臨安）兩縣，以及東陽郡烏傷（今義烏）和長山（今金華）。前者在浙江北部，後者在中部內陸，從漢末到南朝末都有此姓，臨安顯然有大族。[150]此外，晉宋之際有太史

147 《三國志》，卷 57，〈虞翻傳〉，頁 1324（斯敦）；卷 60，〈賀齊傳〉，頁 1377（斯從）。這兩位都是漢獻帝建安年（196-220）以前的人物，斯敦的年代略有疑問，此處不多及。

148 戰國秦昭襄王時（306-251 BC）有將領名為斯離，不確知「斯」是否為姓。見《史記》，卷 5，〈秦本紀〉，頁 212。除了本文所提及的 3 位漢末、南朝人士，現有歷史人名索引、人名資料庫中未見任何唐代以下的斯姓人物。現代則有著名聲樂家斯義桂，祖籍浙江奉化。關於當代斯姓的規模與分布，由於中國似未有任何可公開查詢的姓氏統計資料，難有確切的了解。

149 斯宣達見《隋書》，卷 16，〈律曆上〉，頁 390；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點校本），卷 145，〈樂五〉，頁 3700；郭茂倩，《樂府詩集》，卷 29，頁 425。

150 吳興郡駱姓有殷孝悌母駱氏（長城）、駱牙及其家人（臨安）；東陽郡駱姓有駱統及其家人（烏傷）、駱球及其家人。永嘉太守駱球出於何處，沒有明文記載，但他起家東陽郡吏，又在孫恩之亂時於郡治長山起兵抗擊孫軍，推測為長山人。且由其父、其子都是軍將判斷，應為當地強族。以上所述略見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267-268（謝承《後漢書》，卷 8，〈駱俊傳〉）；《三國志》，卷 57，〈駱統傳〉，頁 1334-1336；《晉書》，卷 10，〈安帝紀〉，頁 259；《宋書》，卷 1，〈武帝上〉，頁 14；《南齊書》，卷 43，〈謝瀹傳〉頁 763；《陳書》，卷 22，〈駱牙傳〉，頁 296-2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駱達，南朝宋有尚書省都令史駱宰，從官職看來都是寒人，顯然也是東南本地人士。[151]東南駱姓大概和遙遠的西北沒什麼關聯，這裡的駱姓明顯是區域性姓氏。

十三、婁。在早期中國，就史籍所見，婁姓分布廣而零散。以兩漢而言，山東東部的齊地、河南西南的南陽地區都有此姓；到了北朝，有鮮卑匹婁氏改為婁姓，唐代則見於河南東部原武（今河南原陽）。[152]但婁姓有個突出現象：浙江東陽郡似乎特別多，例如南朝齊女扮男裝出仕的婁逞，南朝梁僧人慧約（452-535）俗姓婁，都是東陽人。[153]晚唐此地有女術士婁千寶。[154]從現有資料判斷，各地婁姓未必有關聯。姓氏學中有此姓起於諸縣婁鄉（在今山東諸城）的說法，就地望而言，也許可適用於齊地婁姓，但對其他大部分地區，恐怕就無效了。[155]依此，東陽婁姓未必是從傳統華夏區傳來的，可能具有很強的土著色彩。

十四、樓。或許是巧合，樓姓的分布形態與婁姓相似，在兩漢六朝文獻中散見於北方各處，可確定存在的地方有：山東東部的齊地、河南東部的杞縣、安徽北部的蘄縣（今宿州南）；[156]在北朝，鮮卑賀樓氏改

151 見《宋書》，卷 2，〈武帝中〉，頁 48；卷 27，〈符瑞上〉，頁 784；卷 53，〈庾炳之傳〉，頁 1518-1519；《南史》，卷 1，〈武帝紀〉，頁 22；卷 19，〈謝超宗傳〉，頁 542。

152 漢末有劉璋部將婁發，從劉家的起源和發展情況判斷，婁發很可能來自今湖北中西部至四川一帶。這也是婁姓分布廣的一個佐證。見《三國志》，卷 31，〈劉二牧傳・劉焉〉，頁 867 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唐代前期名臣婁師德（630-699）則出身河南原武。

153 見《南史》，卷 45，〈崔慧景傳〉，頁 1143；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6，頁 182。慧約母親姓留，也是土著性格很強的姓。史籍中另有一疑似婁姓的南朝人士，見下「樓」條。

154 《太平廣記》，卷 223，〈婁千寶〉，頁 1713-1715。《太平廣記》說此條出自《雲溪友議》，但今本未見。

155 婁鄉為婁姓起源之說見《新唐書》，卷 74 下，〈宰相世系表〉，頁 3178。婁鄉之名顯然出自古代的牟婁，「牟」為夷名。見楊伯峻，《左傳春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隱公四年，頁 34。

156 《漢書》，卷 92，〈游俠傳・樓護〉，頁 3706-3709（樓護）；《後漢書》，卷 79 下，〈儒林列傳・樓望〉，頁 2580-2581（樓望）；《三國志》，卷 65，〈樓玄傳〉，頁 1454-1455（樓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樓姓。除了上述，浙江東陽郡是樓姓的一個集中地，隋朝及其前史籍中有南朝齊隱士樓惠明、隋末起兵的樓世幹；[157]唐初則有新州治中樓仲興。[158]也和婁姓一樣，樓姓分布零散，彼此關係不明（無論是移民或模仿），東陽的樓姓有可能就是在本地或附近地區產生的。東陽樓姓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該地同時存在婁姓與樓姓，兩字音同形近，而且和華夏核心區都沒有明顯的關係，說不定有同樣的在地來源。南朝齊東陽有禮學家，或作樓幼瑜，或作婁幼瑜，這雖然是傳抄所導致的歧異，但似乎暗示我們，在基層人群，也許有婁、樓不分的情況。[159]中唐《元和姓纂》中樓姓有東陽望，該書說是東漢時遷自譙郡（在今皖北），真偽難以判斷。[160]

十五、東陽。南朝宋何承天（370-447）《姓苑》錄姓氏東陽，本節開端也提及，南朝宋有東陽无（無）疑撰《齊諧記》，多記東陽郡事。這顯然是以郡名為姓，東陽郡為孫吳於公元 266 年所設，可見是土著新姓，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也明說東陽姓出自東陽郡。[161]除了東陽无（無）疑，《元和姓纂》引《祖氏家傳》說祖崇之娶東陽元旋女，祖崇之不知何人，但「元旋」形近「无疑」，說不定是同一人名的訛寫。[162]依此，史料中南朝東陽姓僅一見，唐代以下文獻未能再看到此姓。按，以南方新立地名為姓氏，無疑是自我表露非華夏身分，這類姓氏罕見，

157 《南齊書》，卷 54，〈高逸傳．徐伯珍〉，頁 946；《舊唐書》，卷 56，〈沈法興傳〉，頁 2272。

158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5，頁 728。新州州治在今廣東新興，「治中」為州刺史屬官，高宗朝後改稱「司馬」。

159 關於樓（婁）幼瑜的資料，可見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證》（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 95、106、853。個人覺得，此人姓婁的可能性較高。

160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5，頁 728。

161 鄭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氏族略第二〉，「以郡國字為氏」，頁 75。《姓苑》記東陽姓之事亦引於此。「以郡國字為氏」所載大多是西漢封侯者以國名為姓，與本文議題有差異。

162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1，頁 30。依本節所論，「祖」為山越姓氏，祖崇之與東陽家結親顯然是土著背景領導者間的聯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很難流傳，我只找到兩個類似的情況。西漢初有揭陽定及其家人，是依揭陽縣名（今廣東揭陽）立姓，揭陽定原為當地首領；[163]《元和姓纂》有鄮姓，說是越人以鄮縣（在今浙江寧波）為姓——雖然「鄮」可能原來就是越語地名。[164]以上案例雖少，也透露出華南土著的跡影。[165]

十六、汪。和本文已討論過的姓氏相比，「汪」可能是「東陽」之外最特別的：在現存的隋代以前文獻，沒有任何汪姓，磚石銘文中也尚未見到。早期中國的傳世文獻雖然數量有限，還是含藏了不少訊息，包括大量的罕見姓氏。汪姓不見蹤影，不見得意味秦漢以後的七、八百年間汪姓人士非常稀少，比較恰當的推論應該是，汪姓不是產生於華夏核心區，這個姓躲藏在文字極少觸及的角落。史籍中汪姓最早出現在隋唐之際，一是隋文帝開皇十年（590）起兵自號天子的婺州（原東陽郡）人汪文進；一是隋唐之交統治歙州（原新安郡）十餘年的汪華（587-649）。[166]兩者一出身浙西，一皖南。至有唐一代，汪姓人物見於文獻者仍然寥寥，最大的特徵是，出身地域幾乎都在皖南。[167]各種跡象顯示，

163 《漢書》，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 655。此人是否名為揭陽定，其實略有疑義，《史記》、《漢書》又都稱他為揭陽令（或「令史」）定。我的看法是，他本來名「定」，降漢封侯後採漢式命名法，加上姓氏，成為揭陽定，其子則為揭陽當時。參考《史記》，卷 20，〈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1050；卷 113，〈南越列傳〉，頁 2977；《漢書》，卷 95，〈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南粵〉，頁 3858。司馬貞《史記索隱》也認為「定」是此人的名字。

164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2 冊，卷 9，頁 1388。此條係從《通志．氏族略》補。「鄮」無意義，看來是音譯字，此外鄮縣有鄮山（西晉後之阿育王山），自然地名容易保留原稱。

165 南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論東陽姓，歷數名為東陽的北方城邑，主張浙江東陽姓的祖先必是古代大夫以邑為氏者，其後遷來此地，可見姓氏論述之多不可信。見《古今姓氏書辯證》，卷 2，頁 14-15。

166 《隋書》，卷 2，〈高祖下〉，頁 35；卷 48，〈楊素傳〉，頁 1284（汪文進）；《舊唐書》，卷 40，〈地理三〉，頁 1594-1595；卷 56，〈王雄誕傳〉，頁 2271（汪華）。

167 唯一明載非皖南籍的是小說中所述天寶初蘇州吳縣民汪鳳。見《太平廣記》，卷 140，〈汪鳳〉，頁 1010（原出薛用弱《集異記》）。李白名詩〈贈汪倫〉所指涉的汪倫，據宋人詩注，乃今安徽涇縣人。見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汪是發源於皖南、浙西的土著姓氏。

十七、俞。俞也是稀姓，三國以後始見於史籍。俞姓的最大特點是集中於江南，以下是幾個早期的例子：本姓俞的孫策心腹孫河（?-204），吳人；南朝宋俞陽，山陰（紹興）人；南朝宋壯士俞道龍，吳郡（蘇州）人。[168]在隋代以前，文獻中的俞姓人物幾乎全和江南政權有關，而且在東晉南朝，幾乎都是寒人，可以看出，俞是一般基層百姓間的姓氏。[169]在浙江中南，西晉有俞敬□見於臨海磚文，東晉末有永嘉郡吏俞僉。[170]但俞姓並非只出現於江南及更往南的地區，長江中游的荊州、襄陽也有。[171]江南俞姓和荊襄或其他地區俞姓的關係如何，並不清楚。但整體來說，俞是南方姓氏，就其集中於吳越的特點看來，可以說是江南的區域性姓氏，有相當強的本地性格。至於浙江中南部的俞姓，當是由蘇南、浙北一帶而來。

十八、蔣。蔣姓分布廣闊，但資料零散，看不出明顯的模式，至少在南北朝時期，明顯是南多於北（以淮河為界）。蔣姓的一個特點是，頗見於今天安徽境內的淮河南北，譬如漢末名士蔣幹、曹魏大臣蔣濟（?-249），乃至蔣山神傳說中的蔣子文都是這一帶人。[172]蔣姓在江南也

1990），「天寶十四載」，頁 1212-1213 引楊齊賢說。

168 《三國志》，卷 51，〈宗室傳・孫韶〉，頁 1214（孫河）；《宋書》，卷 91，〈孝義傳・嚴世期〉，頁 2247（俞陽）；卷 94，〈恩倖傳・阮佃夫〉，頁 2313（俞道龍）。

169 史書中東晉南朝俞姓人物的職位大體為皇帝侍從、令史、典籤、武將、宦官等。

170 黃瑞，《台州金石甄文闕訪目》，卷 1，頁 3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59；《宋書》，卷 91，〈孝義傳・俞僉〉，頁 2250。

171 南朝宋俞湛（或湛之）為襄陽人，見《宋書》，卷 84，〈袁顗傳〉，頁 2153；《南史》，卷 26，〈袁顗傳〉，頁 701；卷 45，〈張敬兒傳〉，頁 1136。唐代武則天時有荊州江陵人俞文俊，見《舊唐書》，卷 187 上，〈忠義上・俞文俊〉，頁 4883。晚唐荊州俞姓資料又可見《太平廣記》，卷 74，〈俞叟〉，頁 461（原出《宣室志》）。

172 《三國志》，卷 54，〈周瑜傳〉，頁 1264 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蔣幹）；同書卷 14，〈蔣濟傳〉，頁 450-455（蔣濟）；汪紹楹校注，干寶撰，《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5，〈蔣山祠〔一〕〉，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晉陵（常州）、義興（宜興）、吳興（湖州）都可見到。[173]至於浙江中南，史籍所見，有東晉臨海郡將蔣秀；南朝陳宦官蔣裕為建安郡人（郡治在今福建建甌），也鄰接此地。[174]磚文中臨海則有東晉蔣傖。[175]從以上看來，東南蔣姓大概是從淮河南北經江南傳來，深入東南山區，應該有土著成分。

以上考察了早期浙江中南部的 18 個姓氏，接下來幾點歸納。首先，這個地域所見到的姓氏，有若干是流傳很廣的華夏大姓，它們顯然主要是從黃淮流域透過江南傳入浙江中南的。這類姓氏包括黃、王、許、徐、任等。其中黃姓不但廣布長江以北，而且在華南各地域、各族群中流傳，跟前文考察過的陳、周很相似。其次，本文發現了好些在地性格明顯的姓氏：留、斯、婁、樓、東陽、汪，其中汪姓似乎與皖南關係更深。我們無法肯定說，所有這些姓氏都是在浙江中南及其鄰近區域產生的，但使用這些姓氏的人們顯然大多是土著及其後裔。就如同前一小節所討論的方、金、祖姓，它們可以作為東南原住人群的標誌。

再者，還有一類，可稱為區域性姓氏——某些常見於江南及浙北而往南流傳的姓氏。在早期中國，大部分這些姓氏或者主要存在於江南，或者可能是在這一帶獨立產生的，陶、章、虞、駱、俞都屬於這種情況。朱姓和蔣姓有些不同，兩者明顯是從華北傳來的，但在中國的範圍內，江南是個集中地。浙江中南有不少這類姓氏，顯示了北面吳越地區的強大影響。

---

173 《晉書》，卷 3，〈武帝紀〉，頁 78（吳興蔣迪）；《宋書》，卷 91，〈孝義傳・蔣恭〉，頁 2250（晉陵蔣崇平）、頁 2250-2251（義興蔣恭、蔣協）。

174 《晉書》，卷 94，〈隱逸傳・任旭〉，頁 2438-2439（蔣秀）；《陳書》，卷 4，〈廢帝紀〉，頁 70；卷 7，〈皇后傳・世祖沈皇后〉，頁 128；卷 29，〈世祖九王傳・始興王伯茂〉，頁 359（蔣裕）。

175 黃瑞，《台州甎錄》，卷 2，頁 8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279。該磚紀年為東晉元帝大興三年（3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以上的歸納，這裡還要做幾點進一步說明。首先，除了區域性姓氏，華夏大姓也主要是透過江南傳來，黃姓是可能的例外。此姓流行於華南內陸，包括鄰近浙江的江西，這或許是黃姓輸入的另一條途徑。其次，黃、王、許、徐、任之外，浙江中南的華夏大姓還有前一小節討論過的陳、周、吳。這 3 個姓氏也都見於早期江西（見附表一、二），該處也可能是浙江中南這些姓氏的來源。最後，雖然本文討論的大部分浙江中南姓氏都是從華夏主流區傳來的，或者是廣泛流行的大姓，或者是江南區域姓氏，但並不意味這些姓氏跟浙江中南的原住人群關係不密切。土著取姓，恐怕大都採用常見的姓氏，流行的漢姓因此很多也會有濃厚的土著成分，只是漢晉六朝浙江中南部資料極少，無法具體判斷這類姓氏與土著的關係。從僅有的資料，我猜測朱、王、徐、蔣都有土著色彩。

（四）福建姓氏

終兩漢之世，福建為會稽郡的一部分，只有一個縣。在後世的福州（冶、侯官），絕大部分區域事實上在漢帝國之外。到三國時期，才有孫吳政權積極經營此地，景帝永安三年（260）設建安郡，末帝天紀四年（280）改為建安、晉安二郡，共 10 縣。這應該是福建有比較大規模華夏影響的開始。[176]在兩晉南朝，該地居民應該幾乎都是原住人群及其後裔，即使有移民，絕大多數來自鄰近地區，也多是華南土著，只是有些人華夏化的程度較深。[177]在唐前的華南，福建地位非常邊緣，資料很零星，姓氏資料也是如此，但由於該地居民成分略無疑義，在前文考察的基礎上，有些姓氏的涵義還是可以相當明朗。

目前所見漢末至南朝的福建姓氏中，不少前文已有討論：陳、吳、

176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63-64、73、82、111-114。

177 參見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87-96。從考古所見，東漢時期的福建尚少受漢文化影響；此外，永嘉之亂八姓入閩之說完全不可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黃、王、徐、蔣。除了方和蔣，其他都是流行的華夏大姓，陳、吳、黃還廣泛存在於華南各地與各族群間。華南土著取漢姓，顯然普遍採用流行的姓氏，這造成姓氏往往大者愈大的現象。至於方姓，是東南土著性格很強的姓氏，當是由浙江傳來，蔣是流行於淮河流域與東南的姓氏，應該和方姓一樣，從福建的北面流入。在前文未觸及的福建姓氏中，張姓和陳、吳、黃很像，都是廣泛傳播於華南的華夏大姓，不再細述（參考附表一、二）。接下來提出幾個其他個案，以求進一步認識福建的姓氏圖景。

一、鄭。鄭是早期華夏大姓，就史籍所見，西漢時已經分布很廣，從山東、河南到西北、蜀地都有，甚至遠在帝國邊緣的浙北會稽郡也有兩例（經營西域的鄭吉〔?-49 BC〕、儒者鄭朋）。[178]加上東漢和中古資料一起觀察，除了分布廣闊，鄭姓的另一個特點是頻繁見於華夏地域的東部，從淮河南北至江南、浙北都有，浙江中南部則有南朝東陽信安（今浙江衢州）兩例。[179]這些跡象顯示，東南鄭姓是從北方傳來，而且很早就深入此地。至於福建的情況，福州有東晉穆帝永和元年（345）墓磚上刻有「鄭氏」。傳世文獻中，此姓則首見於隋煬帝大業十年（614）六月與林寶護一起攻破建安郡的鄭文雅。[180]鄭姓應在福建流傳已久，主要來源顯然是今浙江。

二、林。唐以前罕見林姓，即使包括春秋時代的林放、林既，傳世文獻中還寥寥不到 10 例，但分布相當廣，出現於今山東西半部、關中以

178 鄭吉見《史記》，卷 20，〈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1068；《漢書》，卷 70，〈鄭吉傳〉，頁 3005-3006；鄭朋見《漢書》，卷 76，〈張敞傳〉，頁 3226；卷 78，〈蕭望之傳〉，頁 3284。

179 信安鄭姓可見《太平廣記》，卷 141，〈鄭微〉，頁 1015（原出唐初《廣古今五行記》，晉宋之際鄭微）；《陳書》，卷 33，〈儒林傳・鄭灼〉，頁 441（梁陳儒學家鄭灼及其父、祖）。前者雖出神怪故事，揆其文字，似乎實有其人。

180 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福建文博》2013 年第 2 期（福州），頁 65、68；《隋書》，卷 4，〈煬帝下〉，頁 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四川。[181]在此期間，與福建有關的林姓事蹟只有一件，即隋煬帝大業十年六月，「賊帥」鄭文雅、林寶護攻陷建安郡。[182]隋代的建安郡治在後世的福州，林寶護應該就是福建本地人，否則也是來自鄰近的浙南。雖然目前唐以前福建林姓僅一見，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林就是一個極具福建本地性格的姓氏，這可以從唐以後的情況推知。唐五代林姓資訊突然大增，其中知其出身地者，絕大多數來自福建，而且出現在福建道所有地區，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都有，士人和官宦社群中，最知名的泉州莆田林披（733-802）、林藻、林蘊家族也是林姓。[183]現在所知的唐五代登第人物剛好有 100 名，林姓竟占 20 名。[184]上述情況反映林姓在福建必然傳布已久。可以這麼說，唐五代林姓資訊暴增，正是福建在中晚唐興起，能見度大幅提高的結果。時至今日，林最主要仍集中

181 山東的例子見《漢書》，卷 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頁 585（林摯）；卷 88，〈儒林傳・林尊〉，頁 3604（林尊）；《魏書》，卷 13，〈皇后傳・孝文貞皇后林氏〉，頁 332（孝文帝皇后林氏及其叔父）。關中見《魏書》，卷 52，〈段承根傳〉，頁 1158（林白奴）。四川見揚雄，〈答劉歆書〉，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264、266（此文原出《藝文類聚》卷 85）；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0 上，頁 533；卷 11，頁 667（林閎）。

182 《隋書》，卷 4，〈煬帝下〉，頁 87。

183 關於唐五代福建的林姓人物，福州、泉州甚多。建州例可見馬令，《南唐書》，卷 12，收入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以下簡稱《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丙編，頁 5344-5345；陸游，《南唐書》，卷 14，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 9 冊，丙編，頁 5573-5574；《資治通鑑》，卷 293，〈後周紀四〉，頁 9552（林仁翰、林仁肇兄弟）。《太平廣記》有漳州林姓 3 例，見卷 355，〈林昌業〉，頁 2813（原出五代北宋徐鉉《稽神錄》）；卷 390，〈林贊堯〉，頁 3121（原出《稽神錄》）；卷 428，〈勤自勵〉，頁 3481-3482（原出唐戴孚《廣異記》）。汀州林姓可見《太平廣記》，卷 405，〈林氏〉，頁 3266（原出《稽神錄》）。林披、林藻、林蘊為父子，這一家族在《元和姓纂》被稱為林氏晉安支，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5，頁 740。討論見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464-466。

184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342-348「唐五代時期福建科舉登第人物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福建。根據 2005 年的統計，林為福建第二大姓，僅次於陳，佔福建人口 10.17%，約 360 萬人。但在全中國，根據 2010 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林姓人數僅居第 16 位，佔漢族人口 1.18%。[185]福建林姓是否由北方傳來，難以判斷，但它無疑是自行在福建及其周遭大規模傳布的姓氏，冠此姓者自然以土著為主，可以視為東南土著的重要標記。

三、謝。就史籍所見，在早期中國，謝不是大姓，但分布甚廣，後漢三國已見於今山東、蘇北、皖北、河南等地。謝姓的一個特點是，錢塘江以東的今浙江北部是一個集中地，從東漢到南朝都明顯可見，孫吳時撰《後漢書》的謝承就是會稽山陰人。[186]在中古中國，福建謝姓凡二見，一是《搜神後記》中的東晉安帝時（397-418）侯官人謝端，一個是南朝梁時的建安郡（郡治在今建甌）「山酋」謝稀。[187]綜合判斷，謝可以算是區域性的姓氏，福建此姓當是由今浙江傳來。

四、呂。呂是早期中國大姓，分布非常廣，兩漢時已見於山東、河北、河南、西北、塞北，[188]東南方面，長江南北岸也有。呂姓的另一個

185 2005 年的福建姓氏狀況見「2005 年福建省 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http://www.stats-fj.gov.cn/fxwz/jmtijfx/0200605240041.htm（2011 年 1 月 9 日檢索）。2010 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則根據百度貼吧「中國姓氏最新排名、人數及各省分布」，http://tieba.baidu.com/p/2865239354（2018 年 1 月 10 日檢索）。維基百科「中國姓氏排名」則說 2010 年林姓排名第 20 位，占全國人口 0.96%，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姓氏排名（2018 年 1 月 10 日檢索）。無論 2005 年 1%人口抽樣調查或 2010 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資料中都沒有姓氏的項目，只能看到簡略的間接報導。

186 《三國志》，卷 50，〈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頁 1196。其姊為孫權夫人。謝承家族之外，其他三國兩晉浙東謝姓人物可略見《後漢書》，卷 82 上，〈方術列傳・謝夷吾〉，頁 2713-2715（謝夷吾）；《三國志》，卷 58，〈陸遜傳〉，頁 1353 引《會稽典錄》（謝淵）；卷 60，〈鍾離牧傳〉，頁 1392 引《會稽典錄》（謝贊）；《晉書》，卷 29，〈五行下〉，頁 908（謝真）；卷 77，〈何充傳〉，頁 2028（謝奉）；卷 82，〈謝沈傳〉，頁 2151-2152（謝沈家族）；卷 94，〈隱逸傳・謝敷〉，頁 2456-2457（謝敷）；卷 100，〈孫恩傳〉，頁 2632（謝鐵）。其他南朝浙東此姓人物不具列。

187 汪紹楹校注，陶潛撰，《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5，〈白水素女〉，頁 30-31；《梁書》，卷 21，〈王僧傳〉，頁 327。

188 居延漢簡即記有鉅鹿廣阿（在今河北隆堯）人呂孺。見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特點是，廣泛傳播及華夏地區之外：西北部族呂姓甚多，後涼建國者氐人呂光（338-399）即是，休官、羌人間也都有；[189]南方的廣州、交州也可見，如漢初南越國相呂嘉（?-110 BC）。[190]呂姓見於福建很早，3 世紀初孫權統治前期有「會稽冶賊」呂合，冶即今福州。[191]此外，南朝時，會稽山陰與鄰近福建的臨海郡也有呂姓，臨海磚文亦有兩例。[192]呂姓當是由北方傳來，很早就深入東南邊地，浙南、福建冠此姓者應多土著。

五、詹。《三國志》載漢獻帝建安元年（196）孫策集團用兵於福州，當地有「賊帥」詹彊。[193]這是傳世文獻第一次出現詹姓。此後有南朝劉宋文帝太子心腹詹叔兒，從此人的寒素背景看來，當是基層社會出身。[194]另外閩西北早期墓葬中出現兩位詹姓人士的名字，一是西晉詹文□（浦城），一是南朝宋詹橫堂（建甌）。[195]這 4 位是唐前史料中僅有的詹姓。至於唐五代，個人目前所見只有 4 位，其中一位是福州人詹雄，另外詹敦仁（914-979）、詹琲父子也顯然是福建人（詳後）。[196]以上資料雖然

名編年》，頁 30。

189 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86、317-318、321。

190 除了漢初廣州的呂嘉家族，孫吳時有交趾郡吏呂興，當為交州本地人。見《三國志》，卷 4，〈三少帝紀・陳留王奐〉，頁 151-152；卷 48，〈三嗣主傳・孫休〉，頁 1161。

191 此事在獻帝建安十年（205）前後。見《三國志》，卷 55，〈蔣欽傳〉，頁 1286；卷 60，〈呂岱傳〉，頁 1383-1384。

192 《南齊書》，卷 56，〈倖臣傳・呂文度〉，頁 978；《南史》，卷 35，〈顧憲之傳〉，頁 922（以上山陰人呂文度）；《南齊書》，卷 56，〈倖臣傳・呂文顯 呂文度〉，頁 977-978；《南史》，卷 77，〈恩倖傳・呂文顯〉，頁 1932-1933（以上臨海人呂文顯）。磚文則見黃瑞，《台州甎錄》，卷 3，頁 12；卷 4，頁 3b-4a，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337-338、370-371。

193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7。

194 《宋書》，卷 99，〈二凶傳〉，頁 2426、2428、2434。

195 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 65、68。「詹文」後的缺字也有可能不是名字的一部分。

196 詹雄見黃滔，〈潁川陳先生集序〉，見氏著，《唐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6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黃堯圃校明鈔本影印），卷 8。同文亦見《全唐文》，卷 824。另有書家詹鸞，不知何處人。見不著撰

臺灣大學圖書館

稀少，仍可據以推論，詹為東南本地姓氏，而且與福建關聯深厚。

詹姓要到宋代才稍常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DBD）可搜得此期詹姓人士 92 名（彼此多有親屬關係），出身地計 15 處：崇安、遂安、縉雲、山陰、玉山、武進、休寧、浦城、信州（州治上饒）、宣城、閩縣、衢州、婺源、鉛山、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這些地方除武進與山陰，全部在皖南、贛東、浙西至閩北一帶，山陰在浙東，武進則在蘇南。由此更可判斷，詹基本上原為東南土著姓氏，東南山區及其周遭在中古早期逐漸華夏化，此姓人士仍處於基層，北宋中葉以後始逐漸浮現於全國舞台。

關於前面提到的詹敦仁、詹琲父子，是五代後期閩地人物，有詩文傳世。清初吳任臣編《十國春秋》說敦仁是光州固始人（今河南東南固始縣），避亂至福建仙遊（仙游）隱居，又說他曾任小溪場監，於 956 年奏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將小溪場改為清溪縣，即後世的安溪縣。[197]按：閩人的中原祖源主要有永嘉八姓入閩和唐代光州固始兩種說法，兩說都不足為憑。[198]《十國春秋》的根據大概是詹家後人的宗譜，仙遊、小溪皆屬泉州，詹氏父子應該就是泉州本地人。

人，《宣和書譜》，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4，〈送謁光詩〉，頁 3b。

197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 16，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 7 冊，丙編，頁 3641；卷 97，第 8 冊，丙編，頁 4653-4654；卷 112，第 8 冊，丙編，頁 4852。

198 閩人祖源光州固始說涉及唐代史事的兩個說法。一是武則天掌政時，陳元光請置漳州，在後世被尊為開漳聖王，他來自光州固始；另一則是，唐末入閩建立閩國的王緒、王潮、王審知集團來自光州，後世福建上層多出於此。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事屬無稽，他明顯就是漳州本地首領。至於王氏集團，雖然其中有光州的成分，人數可能不多，但以在閩地立國的光環，爾後多為閩人家族所攀附。見楊際平、謝重光，〈陳元光「光州固始說」證偽——以相關陳氏族譜世系造假為據〉，《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廈門），頁 115-127；謝重光，《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尹全海，〈閩人對「光州固始」的記憶與詮釋〉，《中州學刊》2017 年第 1 期（鄭州），頁 110-123。我同意楊際平、謝重光的看法，陳元光為光州固始人之說是攀附王氏集團現象的一環（頁 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六、洪。洪姓的情況和詹很接近。建安八年（203），孫吳統治初期，今福建浦城、建甌一帶發生大規模起事，其中首領有洪明、洪進，這是洪姓首度見於傳世文獻。[199]另《荊楚歲時記》載孫吳有廬陵郡太守洪矩為宣城人；南朝梁則有軍士洪騏驎，顯然出身基層。[200]以上是隋前僅有的洪姓事例。[201]唐五代此姓仍罕覯，知其出身者，計皖北、蘇北揚州各 1 例，蘇南 1 例，徽州地區 2 例，福建 1 例。[202]和詹姓一樣，洪姓至宋代才較多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有此期洪姓人士 105 名，出身地計 21 處：休寧、婺源、鄱陽、南豐、南康軍（治江西星子）、樂平、上元、丹陽、華亭、於潛、天台、義烏、武義、淳安、侯官、閩縣、長溪、懷安、海豐、揚州、開封。[203]在這份資料中，洪姓最集中於皖南（休寧）、贛東（婺源、南豐、樂平）、浙西（於潛、義烏、武義、淳安）和閩北（侯官、閩縣、長溪、懷安）。綜合宋朝與前代資料，洪姓為東

199 《三國志》，卷 60，〈賀齊傳〉，頁 1378。

200 宗懍撰，《荊楚歲時記》，收入〔明〕陳繼儒輯，《寶顏堂秘笈．廣集》第 1 冊（上海：文明書局，1922 石印本），頁 8a；《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1，頁 15；《南史》，卷 58，〈韋叡傳〉，頁 1428。

201 福建泉州發現有南朝梁墓葬磚文「承聖四年上洪方建立」，「洪方」或許為築墓人的名字。見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 64、68。

202 這些人包括：洪孝昌父子（安徽舒城），見《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卷 1，頁 16；洪某父子（江蘇揚州），見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大中〇八六，頁 2315，〈唐故彭城郡洪府君夫人張氏墓誌銘并序〉（彭城似為郡望）；洪慶元家族（江蘇江寧），見吳任臣，《十國春秋》，卷 31，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 7 冊，丙編，頁 3833；洪文用（福建泉州），見《十國春秋》，卷 29，收入《五代史書彙編》，第 7 冊，丙編，頁 3805。另歙州（即後世的徽州）祁門有洪氏女，婺源有洪貞，見《太平廣記》，卷 425，〈洪氏女〉、〈洪貞〉，頁 3463；《太平寰宇記》，卷 104，〈江南西道二〉，頁 2069（洪貞）。〈洪氏女〉原出《歙州圖經》。〈洪貞〉據稱出《述異記》或《婺州圖經》，皆有可疑。

203 開封僅洪子範一例，可能是從南方遷過去的。另洪應辰（1197-1283）在資料庫記為光州固始人，應該是華亭（今上海松江），但據說其先祖來自固始。見衛宗武，《秋聲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5，〈府判中奉洪公墓誌銘〉。

臺灣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

南姓氏，分布形態與詹姓相似，大部分在山區及河谷，但江西中部與江南平原帶例子較多，江北也有。起源地雖難以判斷，其與東南土著關係密切，則是確定的。

現在先就福建的幾個個案略作討論，再對早期東南姓氏觀察所得進行總結。前面已經提示，中古時代的福建遠離華夏核心區，和皖南及浙江中、南部相比，人口組成相對單純，可說完全是土著與華夏化程度尚淺人群的居地。本小節所專門討論的 6 個姓氏可以分為兩類，鄭、謝、呂成一類，它們是常見的華夏姓氏，顯然都是透過浙江中南傳入福建。林、詹、洪則另為一類。這 3 個姓氏具有強烈的土著性格，詹和洪是東南本地姓氏，最主要流行於從皖南到閩北的山區，即使未必是土著自創，也是以土著為主要載體。至於林姓，與北方此姓的關係不可知，但在福建及其周遭傳布特別密集，可以說是特具東南土著性格的唯一大姓，也是福建的代表性姓氏。

綜合以上，本節透過姓氏現象考察早期中國東南土著人群，有以下幾點主要發現。首先，找到不少與東南土著關聯特深的姓氏：方、金、祖、留、斯、婁、樓、東陽、汪、林、詹、洪，在東南土著缺乏族稱的情況下，它們可以被視為此處原住人群實體存在的標誌。這些姓氏性質有差異，例如：方、汪分布偏北，特別見於皖南；林則偏南，以福建為核心。「東陽」可確定為土著自創；有些幾乎確定，如留、斯、詹；有些如金、祖，北方也有，但東南的這些姓氏應該是獨立產生的。可能因為和淵源於華夏的大姓相比，土著性格的姓氏具有特殊色彩，傳播比較困難，因此這些姓氏中，只有林演化為大姓。

東南土著區姓氏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深受江南和浙北的影響。本節所討論的大部分姓氏都流行於長江下游，顯示透過文化傳播、人口移動、國家統治，東南人群大舉接受了吳地的姓氏。這些姓氏又可約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北方傳來的大姓，如周、陳、黃、王、許、徐、任、張、鄭、呂；一類是江南區域性明顯的姓氏，如紀、沈、朱、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陶、章、虞、駱、俞、謝。後者之中有些可能是在這個古吳越舊地獨立形成的，如陶、章、虞、駱、俞，是更深層的土著姓氏。

這裡所述，顯現的是「重層華夏化」的現象，也就是華夏化的過程，直接的動源往往不是以中原為代表的華夏核心區，而是一波一波重層發生的。就本文所見，皖南和浙江中南的姓氏深受江南和浙北影響，福建的姓氏又受浙江西部與中南部影響。漢姓或漢式姓名的採用與漢姓制度的建立是華夏文化擴展的一個重要面向，從這裡所觀察到的重層傳播現象或許也適用於社會文化的其他方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東南姓氏中不但有許多早期華夏大姓，而且有些傳布極廣，往往超過區域性及本土性強的姓氏，如：周、陳、黃、王、徐、張、鄭、吳。[204]這顯示，土著冠姓多選擇流行的姓氏。華夏大姓廣泛存在於東南，並不代表這裡曾有眾多的北來人口，但在唐代中葉以後給了東南人士攀附北方望族的機會。[205]

再者，除了傳自江南、浙北華夏先進區，東南土著姓氏也有內陸原住人群（特別是鄰近的江西）影響的痕跡，這方面的例子有：向、周、陳、吳、黃、詹、洪。華南土著人群之間的互動，也是研究這個區域歷史需要留意的。最後，在考察早期浙閩姓氏現象的過程中，看到若干有關築墓人或製磚人的特殊表述：「哩作」、「立作」、「白田厚唐作」、「康立」、「陳文王爭立」（「作」、「立」指製作），這些稱呼可能意味他們沒有漢式姓名，或還不習慣使用。[206]

---

204 參考 2010 年第六次中國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的浙江、福建姓氏排名，見百度貼吧「中國姓氏最新排名、人數及各省分布」，http://tieba.baidu.com/p/2865239354（2018 年 2 月 4 日檢索）。

205 吳修安指出，在唐代，福建人士郡望有從本地的南安或晉安轉為北方著望的趨勢，見其《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頁 222-236。

206 黃瑞，《台州輿錄》，卷三，頁 13b（年代：354）；卷 4，頁 3b（年代：377），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340、370；黃瑞，《台州金石輿文闕訪目》，卷 1，頁 6b（年代：364），見《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總頁碼 466；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 64-65、68（年代：4 世紀初、378）。「陳文王爭」有可能代表兩個人：「陳文」與「王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本文由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對山越問題的若干探討，一是早期東南姓氏的研究，旨在探索早期中國東南原住人群的面貌。在本研究涵蓋的區域，兩漢時幾乎都是原住人群的聚居地，漢末以後，郡縣統治和華夏化逐漸擴大，但土著及其後裔仍然是社會的主體。關於這些人群，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記載非常稀少，甚至連族稱都很難看到，以致學界只有零星的認識，本文希望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

有關山越的部分，在早期東南人群一片闃然無聞的情況中，孫吳時期的山越是少有的例外，相關研究較多。本文所為，算是「補論」。在這個課題上，我關注的是作為人群的山越的性質。本文討論了山越的非華夏族群色彩、這些人群的特色、他們與國家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些課題，過去的研究雖然也頗有涉及，本文在深入程度和系統性上應該勝於以往。我的核心論點是，無論就政治統治階層的感知或實際社會文化成分而言，山越基本上都是華夏的「他者」。而且，在孫吳，華夏的異類也不限於與政權發生衝突的山越，吳地平野和遠離政權中心的越人也都是。我也指出，到了東晉南朝，仍然偶有山越後裔的記載。雖然這些人群很少再帶有族群異類的標籤，並不代表他們都已華夏化。

除了山越的課題，本文也對早期皖南、浙江中南部和福建的姓氏進行考察。這個部分是和一個方法論的考慮相連結的。個人以為，為了追求對歷史經驗的多方了解，歷史研究應該積極面對文獻記載稀少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往往涉及眾多的人口和重要的社會文化結構。資料缺乏對研究帶來很大的限制，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審慎運用「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的原理，廣泛搜尋具有推論潛能的訊息，偵測資料稀少的現象。姓氏是一種零散的訊息，孤立來看，大多缺乏知識意義，但如果大範圍、從長時段內蒐集，可能產生重要的認識。東南人群很早就使用漢姓或漢式姓氏，本文對此進行研究，得出有關東南土著的重要認識。譬如，本文指認出原生於東南土著區或與東南土著關聯特深的姓氏，在

臺灣大學學術研究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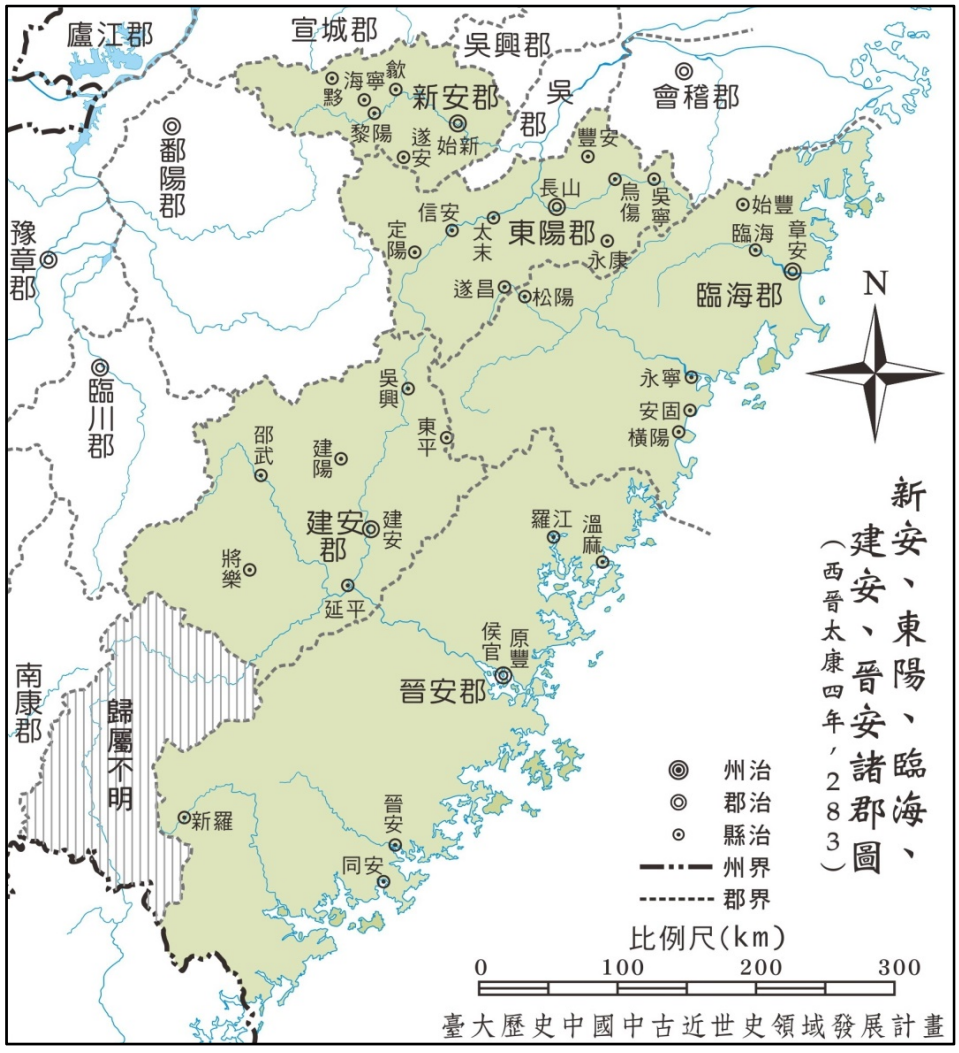
缺乏族稱的情況下，它們可以權充東南原住人群的標誌。另外，本文也展現東南土著區不同地域間的關聯，抉發此地「重層華夏化」的現象。

最後提一點，本文一再指出，除了文獻中短時間出現指稱寬泛的山越和越人，東南人群缺乏族稱（ethnonyms）。這可能意味，掌握書寫機制的政府和士人對土著認識很少；另一種可能是，這些地方沒有大型人群的稱號，他們認同的主要對象是部落、聚落、親屬團體或類似群體的組合，這是常見的情況，在臺灣和青藏高原東緣都可以看到。[207]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吳昌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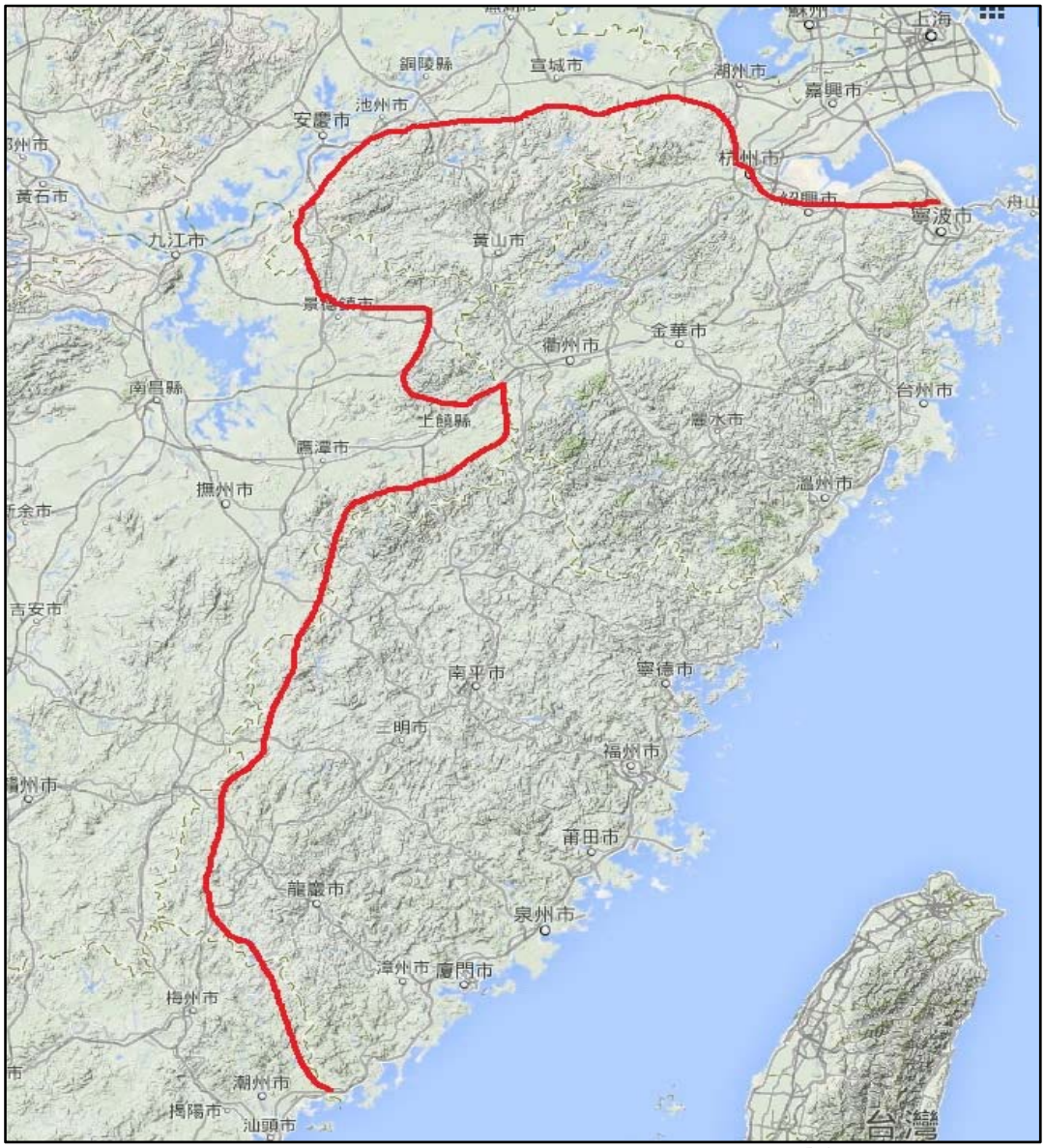
207 參見黃宣衛主編，何有柯（Unak Tafong）口述，吳明義（Namoh Rata）記音／翻譯，《末代 Sapalengaw 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 年錄音重現》（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4），頁 44、46-47、57-58、295、476；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歷史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5-77。

臺灣人類學研究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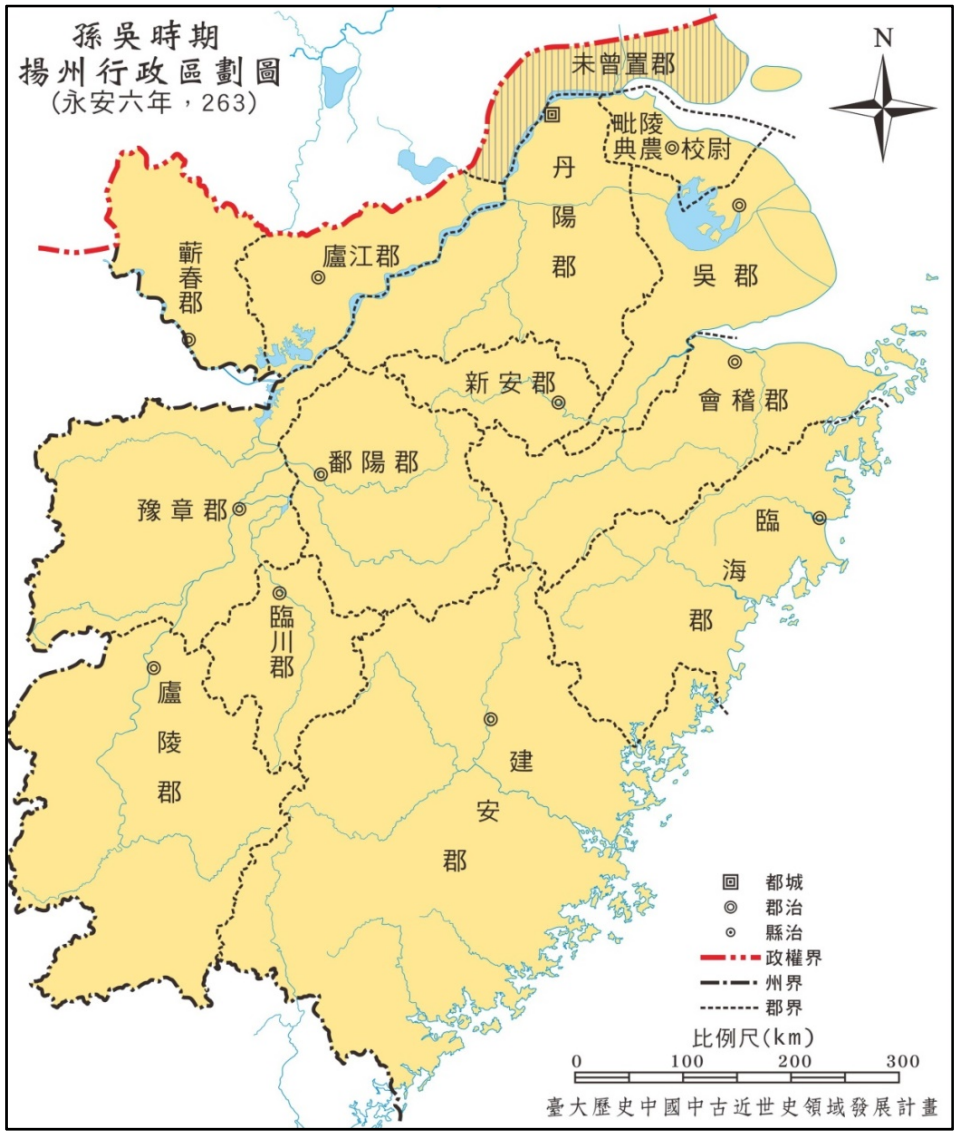
附圖一　西晉武帝太康四年東南諸郡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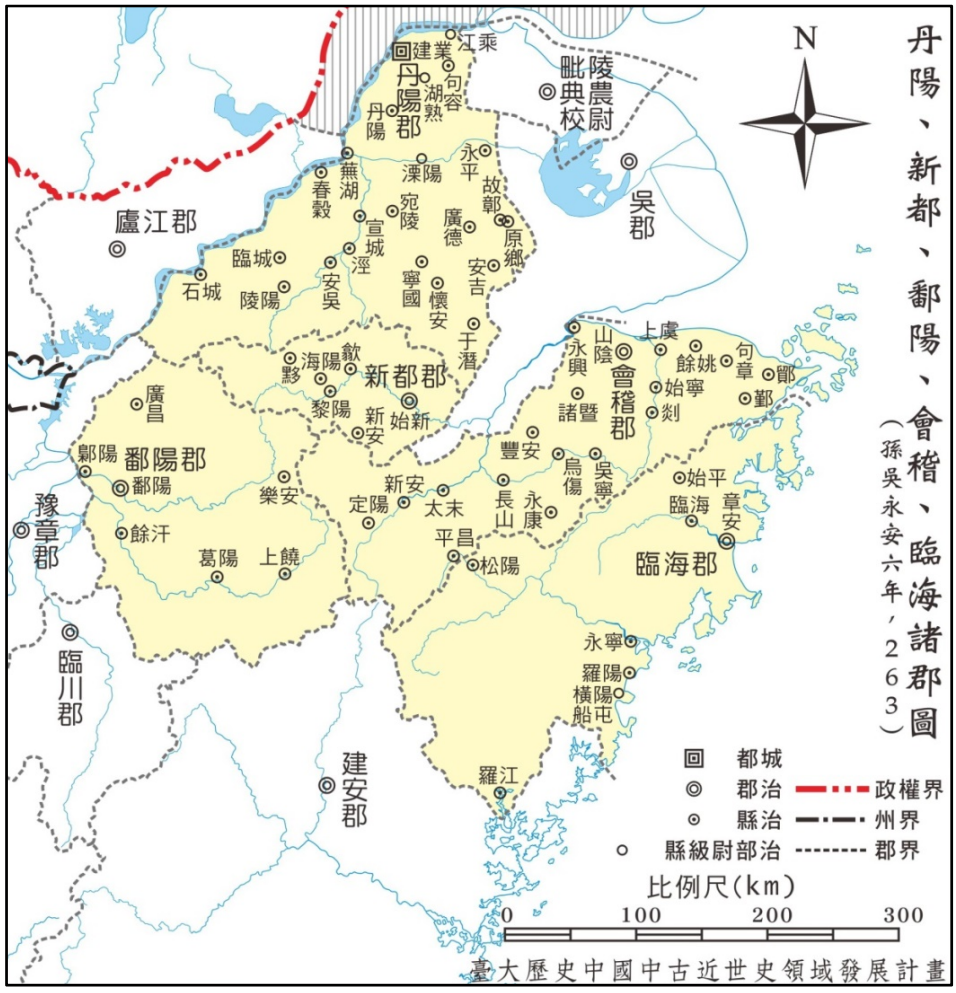
附圖二　中國東南地區地形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三　孫吳時期揚州行政區劃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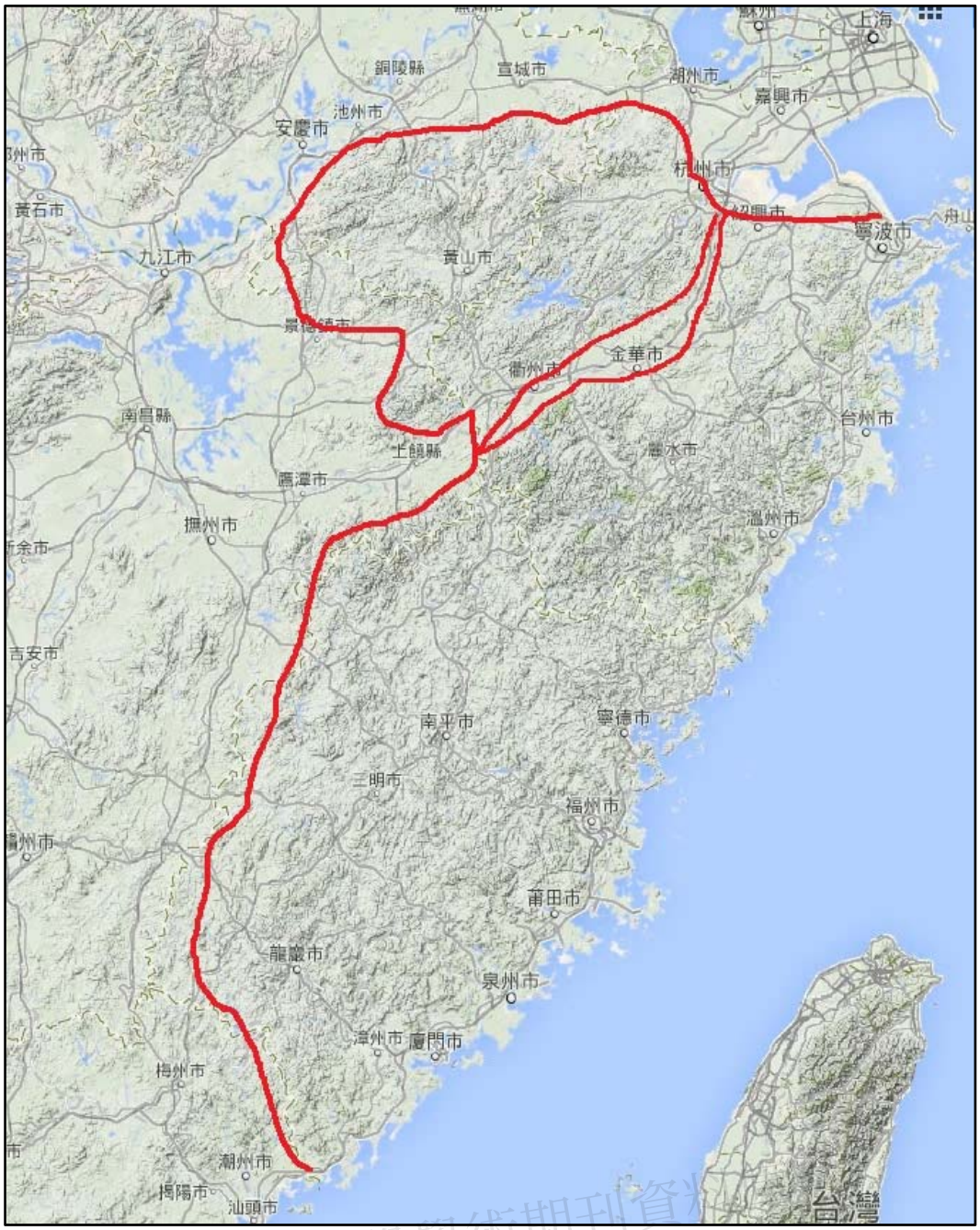


附圖四　孫吳時期丹陽諸郡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五　山越核心區（千島湖是 1959 年所築的水庫，以前無此湖）



附圖六　衢江及錢塘江上中游河谷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

附表一 漢至隋長江中下游及東南地區姓氏略表

編號	1	2	3	4	5	6	7	8
資料與姓氏類別	長沙東牌樓漢簡、走馬樓吳簡所見大姓	郴州蘇仙橋吳簡、西晉簡所見本地姓氏	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所見江西姓氏	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所見皖南、浙西姓氏	《三國志》正文及裴注所見會稽郡北部姓氏	傳世文獻所見東陽、臨海、永嘉郡姓氏	出土文物所見東陽、臨海、永嘉郡姓氏	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所見閩中姓氏
涵蓋地域	湖南長沙及其附近地區	湖南郴州	江西	安徽南部山地與近山部分、浙江淳安	錢塘江以東之浙江北部（排除西晉以下之東陽郡地區）	今浙江中南部	今浙江中南部	福建
涵蓋時間	漢末三國	三國、西晉	漢代至南朝	兩漢三國至隋	三國	東漢至隋	魏晉南北朝	漢末至隋
姓氏	李	李				李	李	
	何						何	何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張				張	張	張	張
	朱		朱		朱	朱	朱	
	范							
	鄧	鄧	鄧					
	潘（番）	潘			潘		潘（番）	
	謝				謝			謝
	烝							
	唐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區	區						
	鄭				鄭	鄭		鄭
	文							
	廖							
	伍（五）				伍	伍		
	胡		胡			胡		
	蔡		蔡			蔡		
	雷		雷					
	盧（盧）				盧	盧	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1	2	3	4	5	6	7	8
姓氏	殷							
	石							
	其餘從略	傀						
			袁					
			熊					
			高				高	
			孟					
			湛（諶）					
			曾					
			桂					
			梁					
			楊	楊		楊	楊	
			聶					
			方	方				方
			万					
			況					
			羅					
			幸					
			莫					
			喻（諭）					
			余（余）				余	
			陶			陶	陶	
			翟			翟		
			烏					
			彭					
			饒					
			淡					
			危					
			修（脩）					
			練					
			哀					
			其餘從略	留		留		
				嚴	嚴		嚴	
				鮑				
				向		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1	2	3	4	5	6	7	8
姓氏				程				
				金				
				焦				
				祖				
				毛				
				紀				
				章		章	章	
				郝				
				沈		沈		
					王	王	王	王
					闞			
					董		董	
					賀			
					邵			
					虞	虞		
					趙	趙		
					丁	丁	丁	
					鍾離			
					許	許	許	
					孫？	孫	孫	
					孟		孟	
					綦毋			
					駟			
					魏			
					曹	曹	曹	
					斯	斯		
					祁			
					樊			
						駱		
						徐	徐	徐*
						柳		
						婁		
						樓		
						龔		
						東陽		
						呂	呂	呂
						任	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1	2	3	4	5	6	7	8
姓氏						費		
						田		
						汪		
						俞	俞	
						郭		郭
						葛		
						宋	宋	宋
						蔣	蔣	蔣
								林
								詹
								洪
								苑
								華
								秦
								隨
								陸
							翁	
							魯	
							簿（薄）	
							富	
							司馬	
							疆	
							虔	
							桓	
							馬	
							道	
							羊	
							抗	
							秦	

資料來源說明（依表內編號排列）：

1.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43-85，特見頁 54；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頁 24-26。東漢簡牘部分全列，吳簡部分則列出 25 個數量最大的姓氏，但非依原順序。近年來秦漢三國湖南簡牘大出，可蒐集更多人名與姓氏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 J4 三國吳簡〉，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52-15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考古輯刊》第 8 集（長沙：岳麓書社，2009），頁 98-102。郴州在三國吳與西晉時期為桂陽郡治，蘇仙橋遺址又為官署所在地，該處發現的簡牘均為官方文書，其中的人名未必全為該郡或附近人士。以此，本表只取縣級官員、吏員與民眾的姓氏。這兩份資料中，以黃姓、區姓特多。
3. 梁洪生，〈考古資料中的唐以前江西姓氏考察〉，頁 68-77；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頁 81-90；魏斌，〈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圍繞胡、鄧二氏為中心的考察〉，頁 80-91。
4. 主要為本文作者蒐集。另有一例見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7。
5. 本文作者依《三國志》蒐集，其中亦含有漢代之姓氏資料。
6. 本文作者蒐集。
7. 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 94-99 附表二；孫詒讓，《溫州古甓記》下冊；黃瑞，《台州甎錄》、《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
8. 傳世文獻部分為本文作者自行蒐集；出土資料依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頁 68 表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　漢至隋華南主要土著姓氏

編號	1	2	3	4	5	6	7	8
資料與族群別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之土著姓氏(推測)	荊南四郡蠻亂中所見姓氏	長沙走馬樓吳簡中之土著姓氏(推測)	文獻所見漢代蠻姓	文獻所見三國至隋蠻姓	山越	江西土著(含溪人)	俚
涵蓋地域	湖南長沙	今湖南省	長沙及附近地區	今四川東部、湖北、湖南	約今四川東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安徽中部、江西北中部	約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	江西	今廣東西部、廣西東部、越南北部
涵蓋時間	漢末三國	東漢	三國	漢代	魏晉南北朝隋　代	漢末三國	兩　晉南北朝	東漢至隋
姓氏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范							
	李	李	李		李			李
	張		張		張	張		張
	朱							
	鄧		鄧					
		胡	胡				胡	
		覃	潭	曇（覃、潭、鐔）	曇（覃、潭、鐔）			
		詹		詹		詹		
		潘	潘	潘		潘		
		區	區					
		相		相				
		羊		羊				
		卜			卜			
		郭						
		蘇						
			向		向			
			石					
			田	田	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1	2	3	4	5	6	7	8
姓氏			魯		魯			
			文		文			
			梅		梅			
			伍					
			鄭		鄭			
			雷	雷	雷			
			趙	趙				
			烝					
			吳			吳		
			唐					
			謝					
			廖					
			秦		秦	秦		
			桓		桓			
			孫					
			樊	樊	樊			
			仇					
			何			何		
			殷					
				滿 （瞞、蠻）				
				巴*				
				羅				羅
				朴				
				督				
				鄂				
				度				
				夕				
				龔				
				許				
				高				
				法				
					冉			
					世			
					成			
					柳			
					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1	2	3	4	5	6	7	8
						祖		
						焦		
						金		
						毛		
姓氏						費		
						施		
						隨		
						洪		
						呂		
						斯		
						常		
						尤		
						彭		
						董		
							余	
							侯？	
							熊？	
姓氏								岑
								王
								莫
								冼
								馮
								并
								鍾
								蔣
								虞
								杜
								龐
								梁
								寧

資料來源說明（依表內編號排列）：

1.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頁 57-62。
2.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頁 68-70。
3. 參考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頁 27-32。
4. 根據以下資料製作：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05-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05-229。「蠻」分布甚廣，江北亦多，參見「涵蓋地域」一欄。
6. 主要根據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32、234-242 略作增刪。陳書對山越的界定頗粗疏，此處但觀其大略，非詳考也。
7. 參考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42-246；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於 1938 年），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51-55。
8. 參考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 256-2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班　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范　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陳　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沈　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蕭子顯撰，《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姚思廉撰，《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魏　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魏　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李延壽撰，《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劉　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影印。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周祖謨，《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 據 1951 年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本影印。
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李劍國輯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魯　迅，《古小說鉤沈》，收入《魯迅全集》第 2 卷。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 影印本。
汪紹楹校注，干寶撰，《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79。
汪紹楹校注，陶潛撰，《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宗　懍撰，《荊楚歲時記》，收入〔明〕陳繼儒輯，《寶顏堂秘笈・廣集》第 1 冊。上海：文明書局，1922 石印本。
常　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 　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
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新 2 版據 1965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影印。
杜 　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點校本。
岑仲勉校記，郁賢皓、陶敏整理，孫望審訂，《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徐 　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2 版。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吳 　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 9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 1 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黃 　滔，《唐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6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黃蕘圃校明鈔本影印。
董 　誥等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 影印。
道 　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獨孤及，《毘陵集》。四部叢書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馬 　令，《南唐書》，收入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
陸 　游，《南唐書》，收入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
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
王欽若撰，《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影印明刻本。
李 　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第 3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
李 　昉，《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點校本。
李 　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點校本。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點校本。
〔題〕曾 　鞏，《隆平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贊 　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點校本。
沈作賓修，施宿等纂，《嘉泰會稽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影印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
洪 　适，《隸釋》，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史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固安劉氏藏明萬曆刊本影印。
計有功，《唐詩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新一版。
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影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嘉慶二十三年（1818）宋世犖重刻本。
鄧名世撰，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鄭　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
不著撰人，《宣和書譜》，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衛宗武，《秋聲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吳任臣，《十國春秋》，收入傅璇琮、徐海榮、徐吉軍主編，《五代史書彙編》。
黃　瑞，《台州甎錄》、《台州金石甎文闕訪目》，皆收入氏編，《台州金石錄》（民國五年嘉業堂鉛印本），《地方金石志彙編》第 47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孫詒讓，《溫州古甓記》（民國間鉛印本），收入賈貴榮、張愛芳選編，《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下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錢儀吉纂，《碑集傳》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李振宏、孫英民，《居延漢簡人名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李國玲編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0-1990。
倉修良主編，魏得良、王能毅副主編，《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後漢書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4。
張舜徽主編，崔曙庭、王瑞明副主編，《三國志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 J4 三國吳簡〉，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7 輯，頁 152-1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蘇仙橋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考古輯刊》第 8 集，頁 98-102。長沙：岳麓書社，2009。

二、近人研究

尹全海，〈閩人對「光州固始」的記憶與詮釋〉，《中州學刊》2017 年第 1 期，鄭州，頁 110-123。
王子今、馬振智，〈烝姓的源流——讀《嘉禾吏民田家莂》劄記〉，《文博》2003 年第 3 期，西安，頁 46-49。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歷史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王萬雋，〈漢末三國長沙族群關係與大姓研究之一——漢末部分〉，《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43-85。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
吳春明，〈福建秦漢墓葬文化類型及其民族史意義〉，《東南文化》1988 年第 3、4 期，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頁 92-95、146。
吳修安，《福建早期發展之研究——沿海與內陸的地域差異》。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9。
呂思勉，〈山越〉，收入氏著，《呂思勉讀史札記（增訂本）》，頁 640-6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5 年 6 月，臺北，頁 1-26。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刊於 1938 年，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 33-10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0 期，北京，頁 66-69。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入《學術研究》編輯部編，《史學論文集》，頁 1-17。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 3-29。北京：三聯書店，1955。
梁洪生，〈考古資料中的唐以前江西姓氏考察〉，《江西文物》1991 年第 2 期，南昌，頁 68-77。
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第 10 輯，頁 81-9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陳　博，〈韋昭《吳書》考〉，《文獻》1996 年第 3 期，北京，頁 68-77。
陳可畏，〈東越、山越的來源和發展〉，收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歷史論叢》第 1 輯，頁 161-176。北京：中華書局，1964。
陳明忠，〈試析福建六朝墓磚銘文〉，《福建文博》2013 年第 2 期，福州，頁 62-69。
陳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階層興起的幾點觀察〉，收入氏著，《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頁 457-496。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程凌雷，〈建國以來山越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 年第 2 期，北京，頁 3-9。
黃宣衛主編，何有柯（Unak Tafong）口述，吳明義（Namoh Rata）記音／翻譯，《末代 Sapalengaw 的話：馬太安大頭目 Unak Tafong 1958 年錄音重現》。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4。
楊　琮，〈福建崇安城村古城遺址出土文字及考釋〉，《東南文化》1993 年第 1 期，南京，頁 118-135。
楊際平、謝重光，〈陳元光「光州固始說」證偽——以相關陳氏族譜世系造假為據〉，《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廈門，頁 115-127。
劉　波，〈浙江地區西漢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2000 年第 1 期，南昌，頁 58-69。
鄭張尚芳著，孫琳、石鋒譯，〈《越人歌》解讀〉，收入南開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論叢》編委會編，《語言研究論叢》第 7 輯，頁 57-65。天津：語文出版社，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鄭張尚芳，〈句踐「維甲」令中之古越語的解讀〉，《民族語文》，1999 年第 4 期，北京，頁 1-8。
鄭睿瑜，〈浙江地區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碩士論文，2017。
鮑遠航，〈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考述〉，《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 年第 4 期，金華，頁 84-88。
謝重光，《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嚴文郁編，《清儒傳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魏　斌，〈南朝前期豫章郡的豪族——圍繞胡、鄧二氏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9 輯，頁 80-91。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魏　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收入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24 輯，頁 23-45。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證》。東京：汲古書院，1995。
川本芳昭，〈六朝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蛮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頁 443-486。東京：汲古書院，1998。
川勝義雄，〈孫吳政權と江南の開發領主制〉，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頁 143-170。東京：岩波書店，1982。
池田溫，〈唐代の郡望表——九・十世紀の敦煌寫本を中心として——（上）〉，《東洋學報》第 42 卷第 3 號，1959 年 9 月，東京，頁 57-95。
泉井久之助，〈劉向「說苑」卷第一の越歌について〉，《言語研究》第 22、23 合冊，1953 年 3 月，東京，頁 41-45。
Brindley, Erica. “Barbarians or Not? Ethnicity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Ancient Yue (Viet) Peoples, ca. 400-50 BC.” *Asia Major* 16, no. 1 (2003, Taipei), pp. 1-32.
Goldstein, Leon. *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Goldstein, Leon. *The What and the Why of History: Philosophical Essays.* Leiden: E. J. Brill, 1996.
Megill, Allan.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Tucker, Aviez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三、網路資料

「2005 年福建省 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http://www.stats-fj.gov.cn/fxwz/jmtijfx/0200605240041.htm（2011 年 1 月 9 日檢索）。
「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度貼吧「中國姓氏最新排名、人數及各省分布」，http://tieba.baidu.com/p/2865239354（2018年1月10日、2月4日檢索）。

維基百科「中國姓氏排名」，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姓氏排名（2018年1月10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3 (June 2019), pp.1-8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06_(63).0001

Aborigines in Early Southeast China (ca. 200-600 C.E.): The Case of Shanyue (Mountain Yue) and Surname Analysis

Chen, Jo-shui*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boriginal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approximately from the end of Han to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The geographical area covered includes the mountain regions of modern southern Anhui (Anhui south of Yangtze River), central and southern Zhejiang, and the entirety of modern Fujian.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part is on Shanyue peoples (Mountain Yue) of the Wu stat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ra and shortly before, and the other tries to draw a picture of aboriginal populations in early southeast China through an analysis of surnames in that area and adjacent regions. During the Han era, the territories covered in this study were predominantly inhabited by aborigines. Even after the Han, for a long period, aborigines and their descendants still constituted the main population. But there is a conspicuous l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these populations; even ethnonyms are hard to find. As a result, the knowledge about these populations has been extremely vague, and this study intend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aborigines in early southeast China, Shanyue is the only case whe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nformation exis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joshuichen@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nyu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Wu state and mainstream society. On these subjects, this article probably exceeds previous researches in depth and systemization. This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surnames in early southeast China. The task comes out of 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for the sake of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historians should confront the issue of how to work on subjects lacking in source materials. It is because these subjects are often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related to a large portion of a given society. In dealing with the limits brought about by the paucity of source materials, we historians could utilize with caution the epistemological principle known as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We could collect information with great inferential potential and try to detect phenomena usually hidden from eyesight. Surnam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name system that was firmly established before the Qin unification of China in 221 B.C. and tha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ulturating peoples in areas that later became parts of China. Surnames are normally fragmentary information with little significance in isolation. But if we collect them broadly, systematically and from a long period of time, important findings may come out. Aboriginal peoples in southeast China adopted Chinese or Sinic surnames widely, the latest by the second century C.E.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aborigines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Shanyue (Mountain Yue), surnames in early China, Sinicization in early China,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